



可避免的战争

在“战略接触”结束之际，关于中美关系的思考



可避免的战争

在“战略接触”结束之际，关于中美关系的思考

2018 年 演讲精选集

陆克文

澳大利亚第 26 任总理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

2019 年



亚协政策研究院致力于协助解决攸关亚太地区安全、繁荣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政策挑战，以及促进区域内达成共识与价值认同。在顶级顾问、研究员以及合作伙伴的通力协作下，作为应用型智库的亚协政策研究院有能力为政策发展提供独一无二的平台。陆克文于 2015 年 1 月担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创始主席。

作者介绍

陆克文于 2007 至 2010 年任澳大利亚第 26 任总理，2010 至 2012 年任外交部长，并于 2013 年重返总理之位。在担任总理期间，陆先生领导澳大利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使澳大利亚成为所有发达经济体中唯一没有遭遇经济衰退的国家。陆先生亦是国际公认的二十国集团（G20）创始人之一。陆先生也担任国际多边机构独立委员会主席，领衔一项为期两年的对以联合国系统为核心的国际多边机构系统的审核报告。报告题为《迈向 2030 的联合国：在裂变的世界中重塑全球秩序》，于 2016 年 8 月在世界范围内发布。陆先生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并在 2015 年 4 月发布哈佛报告《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来实现中美共同使命》。陆先生亦为英国皇家战略研究所杰出访问学者，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卓越政治家，以及保尔森基金会杰出成员。陆先生研习中文 30 余年，现为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的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名誉教授。陆先生创立了澳大利亚国家道歉基金会，以协调并消除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之间的分歧，同时创立了亚太共同体基金会以促进地区安全、经济和环境领域的合作，推动了高效的区域机构体系在未来的发展。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和亚洲协会在公共政策事务和其出版物中所涉及的问题上不提出任何机构立场。本报告中包含的所有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均属于作者，并不反映组织及其董事会、员工和支持者的观点。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版权所有

网站 :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

推特 :@AsiaPolicy

脸书 :facebook.com/AsiaPolicy

邮箱 :policyinstitute@asiasociety.org

New York

725 Park Avenue, 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21

+1 212 288 6400

Washington, D.C.

1779 Massachusetts Ave, NW, Suite 810

Washington, DC 20036

+1 202 833 2742

目 录

前言 5

格雷厄姆·艾利森 哈佛大学

自序

1. 理解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崛起 12

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演讲
2018年3月5日

2. 习近平、中国和全球秩序：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影响 27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演讲
2018年6月26日

3. 中美关系风雨飘摇：贸易、投资和高技术的新战争 37

在亚洲协会硅谷中心的演讲
2018年9月13日

4. 中美：可免一战 49

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
2018年10月10日

5. 美国、中国和东南亚：东盟能否找到新的战略平衡？ 61

在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
2018年11月8日

6. 2019年的中美关系 73

在纽约亚洲协会总部的演讲
2018年12月5日

前 言

21 世纪国际关系的决定性问题是**中国崛起与美国统治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的影响正在重新定义以美国为首制定并维护的国际秩序。想要深入了解这个宏大时代命题的读者有福了——澳大利亚第 26 任总理、“中国通”陆克文先生在这本合集中对此问题做了精妙分析——这些分析通常只有国家总统或总理才能看到，而现在你我这样的读者也能借此集一探究竟，真是羡慕世界上最好的专业情报机构。

陆克文对当今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剖析，来源于他长期以来对中美两国的深入了解，也来源于他与两国领导人持续不断的对话而形成的独特体会。与李光耀和基辛格一样，陆克文成功地与中美两国政府和民间领导人建立深刻联系，因此既能够与政府沟通民间社会的情况，也能与民间社会分析关于政府的见解，并从独立的第三方视角向中美双方提出建设性的观点。

如此角色，陆克文尤其胜任。作为澳大利亚人，他地理上在亚洲，文化上属西方。他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中英双语，能与中国人和美国人用其母语交谈。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澳大利亚是最可靠的盟友之一，地位特殊。的确，澳大利亚是自一战以来唯一一直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亦将澳大利亚视为亚洲大国，纵然澳大利亚具有西方特点。

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官，陆克文 20 世纪 80 年代就被派驻北京。后来他成为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和外交部长，最终成为总理（2007–2010，2013）。2010 年，他以总理的身份，接待了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澳洲的 10 日访问。这些经历让他拥有国家元首的独特视角，对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联系也更加敏感——这些都对他分析国际挑战大有裨益。

2018 年，华盛顿对于中国的传统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彭斯副总统在 10 月演讲中总结了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挑战的“新兴战略”。正如他所宣布的那样，特朗普政府决心全面反击中国，因为美国认为在过去 25 年中，中国一直在对美国“冷战”，美国却没有回应。此前的美国政府们进行了一场豪赌。他们认为，将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就能通过发展走向正常的自由市场经济、民主、保障人权的法治，并接受自身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地位。正如彭斯直截了当地说的那样，他们赌输了——留给特朗普政府一个烂摊子要收拾。

在这场风暴中，中国领导人严正宣告，他们长期以来的怀疑已被证实：贸易战只被视为“遏制”中国的手段之一。由于美国人认识上的巨变，中国战略学家开始回顾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重新研究他的见解——斯巴达因雅典崛起而恐惧，进而导致灾难性战争。

正如修昔底德所解释的那样，崛起大国影响守成大国的客观现实足以带来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客观事实还会被主观解释，从而放大误解和增加失算。处于竞争中的双方，当一方“知道”对方的“真实动机”时，会主观曲解对方的每个举动来重复验证已经“知道”的对方的“真实动机”。

也正如陆克文所阐释的，这种情况正在推动两国进入一场只会导致对抗的竞争——甚至战争。因此，两国的高级智囊团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在2018年的一系列演讲中，陆克文阐明了这一挑战。3月，在西点军校，他从政权存亡问题开始，说明了中国核心利益的七个层面。6月，在新加坡，他解释了年轻时期接触马克思主义如何继续影响着习近平的世界观。9月，在硅谷，他提醒我们注意高技术领域这个中美竞争的新战线，让我们看到中美技术战的影响是双方“争取守住将驱动或摧毁21世纪经济的新技术的制高点”。10月，在海军学院，他强调美国对华政策从“战略接触”到“战略竞争”的重大转变，概述了美国制定连贯的对华战略，必须回答的十大关键问题。11月，在雅加达，他分析了新兴的中美战略对抗将如何影响东南亚。最后，12月，在纽约，他用精彩的演讲告诉我们，在中美越来越互不信任的背景下，2019年两国关系将如何发展。

陆克文直接提出的问题包括：习近平如何看待世界，他想要什么，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如何变化？美国在特朗普治下会如何变化？过去40年巩固的中美关系而今起了多少波澜？根据新的共同战略对话，是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战略均衡，还是新的战争状态（冷战或其他形式）？哪一种是当前不可避免的呢？

正如陆克文总结的那样：

我们正在处理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夹在一场辩论中间：一方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主政体，另一方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古老的持续未断裂的文明，而且后者从未在历史上表现出任何对自由民主的真实兴趣。

但是不论用何种方式，我们必须努力解决问题。

格雷厄姆·艾利森博士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创始院长

自序

在中美关系近 40 年历史中，2018 年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转折点。这不仅仅是美国的观点，也是中国的看法。基于我对中美关系近 40 年的观察，我同样如此认为。

在中国根据邓小平的决定，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开放之后，美国与中国开始了 40 年的战略接触，但今天，美国得出结论：中国不再是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这便是 2018 年中美关系战略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战略接触时期美国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在国内，已经开始进行一系列经济、社会以及部分政治改革；在国际上，正在逐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事实依据是：1978 年中国决定放弃支持全球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政策；随后中国放弃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追求了十多年的政治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中国决定进行持续市场经济改革：首先是在农业领域采用基于价格的激励措施，然后是轻工业、服务业，逐步延伸到中国经济的其余部分。除此之外，就是中美政治关系的正常化：从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到 1979 年卡特政府正式与中国建交，再到中美两国携手应对苏联这个共同的战略对手。

尽管两国关系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起有伏，但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假设没变，中国从改革开放开启的长期的、不可逆转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改革计划，对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价值、利益和国际秩序不构成长期威胁。事实上，一些美国人认为，如果中国的改革计划继续下去，即使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头号经济大国，甚至最终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大国，其本身也并不构成对美国利益的根本威胁，亦不会扰乱全球秩序的稳定。

照此来看，随着中国逐渐变得更加“资本主义”，更加“民主化”，为维护自身作为全球大国的利益而更加依赖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中国将逐步接受、继承并发展该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逻辑——新兴大国终将受到守成大国的挑战——将不会实现，因为权力可以和平让渡。

然而，过去 40 年形成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逻辑在 2018 年崩溃了。这不仅是特朗普政府的特殊性所致（尽管这具有极大的催化作用），还因为美国对中国这个全球大国的长期发展轨迹，及背后的战略意图，进行了更为深远的分析。美国政界，共和党或民主党，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美国外交和情

报机构，以及方方面面的美国企业，都基本下了这个结论：中国的国内政策并没有更加国际化，而是愈加民族主义、重商主义。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国内外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低；政治体系非但没有逐渐自由化，反而越来越不自由。

在国际上，美国看到的是一个不再满足于战略现状的中国，一个寻求改变战略现实的中国，无论是通过在南海造岛、一带一路倡议，还是通过各种网络战略（虽然在战术上会有温和调整）。出于这些原因，在 2018 年，美国国内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战略共识：中国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长期战略接触来同化的战略伙伴。基于此，美国的结论是，中国现在已经成为战略对手。因此，是时候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的对华战略了。这些结论又因美国精英的感受而得到巩固——美国精英普遍认为，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蒙蔽美国，而美国的应对一直太天真且想当然。因此，趁现在还来得及，美国必须转变战略，直面中国战略现实。因此，2017 年 12 月，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挑明：美中战略接触期已经结束，新的战略竞争期开始了。

可以说，1949 年后的中美关系史，进入危机丛生的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敌对，从 1949 年持续到 1972 年。第二阶段是战略接触，持续时间差不多是第一阶段的两倍。现如今，中美正处于战略未知的新时期。正如我在本集所载的一些演讲中所说，在新的“战略竞争”时期，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是：前路迷茫，无矩可循。

无论当前对战略接触期的批评显得多么名正言顺，现实情况是，这一时期产生了中美合作的深层行为结构——这些合作的基础是一系列正式、非正式的协议、规则和双边合作观。现在中美合作的深层结构消逝得比我们想象得更快。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一套能够管理双方紧张关系的战略认知来取而代之。在国际关系史上，通常在大国双边关系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可能会发生最重大动乱——危机、冲突甚至战争的风险加剧——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

由于上述原因，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我发表了系列演讲，试图了解中美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务实地做些什么。我这么做的首要战略目的是：承认中国崛起，维护自由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维护亚洲和平，及此和平所支撑的过去半个世纪的亚洲经济增

由于上述原因，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我发表了系列演讲，试图了解中美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务实地做些什么。我这么做的首要战略目的是：承认中国崛起，维护自由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维护亚洲和平，及此和平所支撑的过去半个世纪的亚洲经济增长奇迹。

长奇迹。

2018年3月，我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提出理解习近平世界观的七要点。我尝试界定中国战略方针中哪些是长期不变的，哪些是自习近平上台后发生变化的。我的结论是：维持现状，非当今中国所愿。

之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讲话中，我试图进一步探讨习近平宏大战略的思想基础。这让我开始重新审视习近平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起源（这似乎有点不时髦）。我的结论是：在中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不再被淡忘，而是重新成为中国国内和国际行为背后的重要推动力。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正式宣告美中关系战略接触阶段的结束和战略竞争时期的开启。随后，我在美国海军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讲，向美国的政治政策精英们提出十个基本问题，试问美国在副总统所提的新战略框架内能做什么、将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2018年下半年的头等大事是中美贸易战，起初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一系列关税，随后引发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反击。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贸易战掩盖了中美关系中更为根本的经济现实，其核心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对自身高技术产业的政策支持，以及中国制造2025战略下中国维护自身在人工智能等新信息技术领域的制高点的决心。因此，9月份我在亚洲协会硅谷中心发表演讲，试图解释当时中美之间已经开始的“技术战争”。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新时期对东南亚的影响尤为重大。随着东南亚国家越来越受到相互竞争的安全和经济力量的拉拢，东盟要为地区共同和平与繁荣找到新的战略平衡点。这是我11月份在雅加达向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协会表达的核心信息。

最后，中国经济增速在2018年的放缓，引发了国内有关当前经济政策方向的大讨论。市场经济改革步伐放缓，国有企业的回归，国内对新的混合所有制模式的困惑，以及中国私人投资者信心的普遍走低，这些都给中国领导层带来了新的困境。一方面，习近平政府必须继续发展经济，以防止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重申政治领导，以应对包括不断发展的企业阶层可能对党的权力造成中长期威胁在内的诸多挑战。12月我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的公开演讲探讨了这中国政治经济中固有的紧张态势。

处理2018年中美关系的最复杂因素之一是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和战略之间的相互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可分割。因此，在尝试确定中国发展道路、美国发展道路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时，我们在分析中尽可能地将所有这些线索全盘考虑。这至关重要，很是不容易，考虑到中国国

内政治的不透明以及中国经济可靠数据的缺乏。尽管如此，要了解崛起中国的全貌，以及中美关系新动态的影响，全局分析是必经之路。仅靠汉学家、经济学家或外交政策分析家单兵作战来分析中国，而不顾及其他领域对全局所产生的复杂影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而且，片面的观点和分析，在当下的环境中，是有战略危险的。大多数对中国崛起带来问题的国际分析都是根据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很少有在中国之外的分析人士注意中国如何看待各种现实问题。毋庸置疑，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完全是另外的情状。中国国安机构中许多人长期以来认为美国在实施遏制中国崛起的政策。在 2018 年，这种观点开始重返中国政治政策精英的心中，无论政治立场的左右。

中国也深信，美国和西方针对中国的行为，是由潜在的种族主义驱动的——他们根本无法容忍，250 年来，世界最大经济体将是非西方式的。大多数西方国家认为，自由民主是普世标准，应该让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接受，虽然西方在亚洲、非洲有 500 年的不堪入目的殖民侵略史。中国对西方的这种论调不买账。中国也认为西方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攻击是极其虚伪的，因为战后美国自己的军工机构就在支持美国工业发展；美国军方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也帮助孵化了美国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产业。的确，“西方式虚伪”在中国官方话语中越来越频繁出现——西方如今要将自己的准则强加到中国的行为上，却在过去不曾以相同的准则来要求自己——这是双重标准。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之间潜在的认知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展望 2019

2019 年，一个大家都关切的问题是，鉴于 2018 年所形成的新的不确定因素，中美两国能否和平而富有成效地在新的一年谈好，处理好两国关系。在我看来，

首先，中美贸易战很可能会有些解决方案。但这并不能解决两国的主要经济博弈——在网络、信息技术主导和全球标准制定方面，经济战还在继续展开。

第二，如果特朗普总统处境愈发艰难（考虑到通俄门调查的累积影响），那么未来两年，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对华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双倍下注，以彰显美国总统维护和捍卫美国国家安全的强硬。

第三，如果习近平主席由于国内经济下滑而面临持续压力，那么中国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上更加民族主义的可能性会持续增加。大陆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可能加剧。但是，就中美关系的稳定性而言，

更为关键的是，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可能会变得更具对抗性。因此，飞机或海军舰艇之间碰撞的累积风险也可能变得更大。中美危机管理的极限可能受到挑战。

第四，暂时解决中美贸易战可能对稳定全球经济有所帮助。但我们尚未充分考虑，由于非中美贸易战因素所导致的全球经济的大幅放缓，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虽然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重新刺激经济增长，但这是否会成功扭转经济下行还未可知（特别是考虑到因为全球增长放缓而导致的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急剧放缓的因素）。习近平可能面临的最糟糕经济情况是，中国国内经济未能因国内经济杠杆增加而转暖，而全球经济下滑将加剧国内经济增长的减速。与 2018 年相比，2019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可能会使中国在处理与美国关系的总体复杂性时更加民族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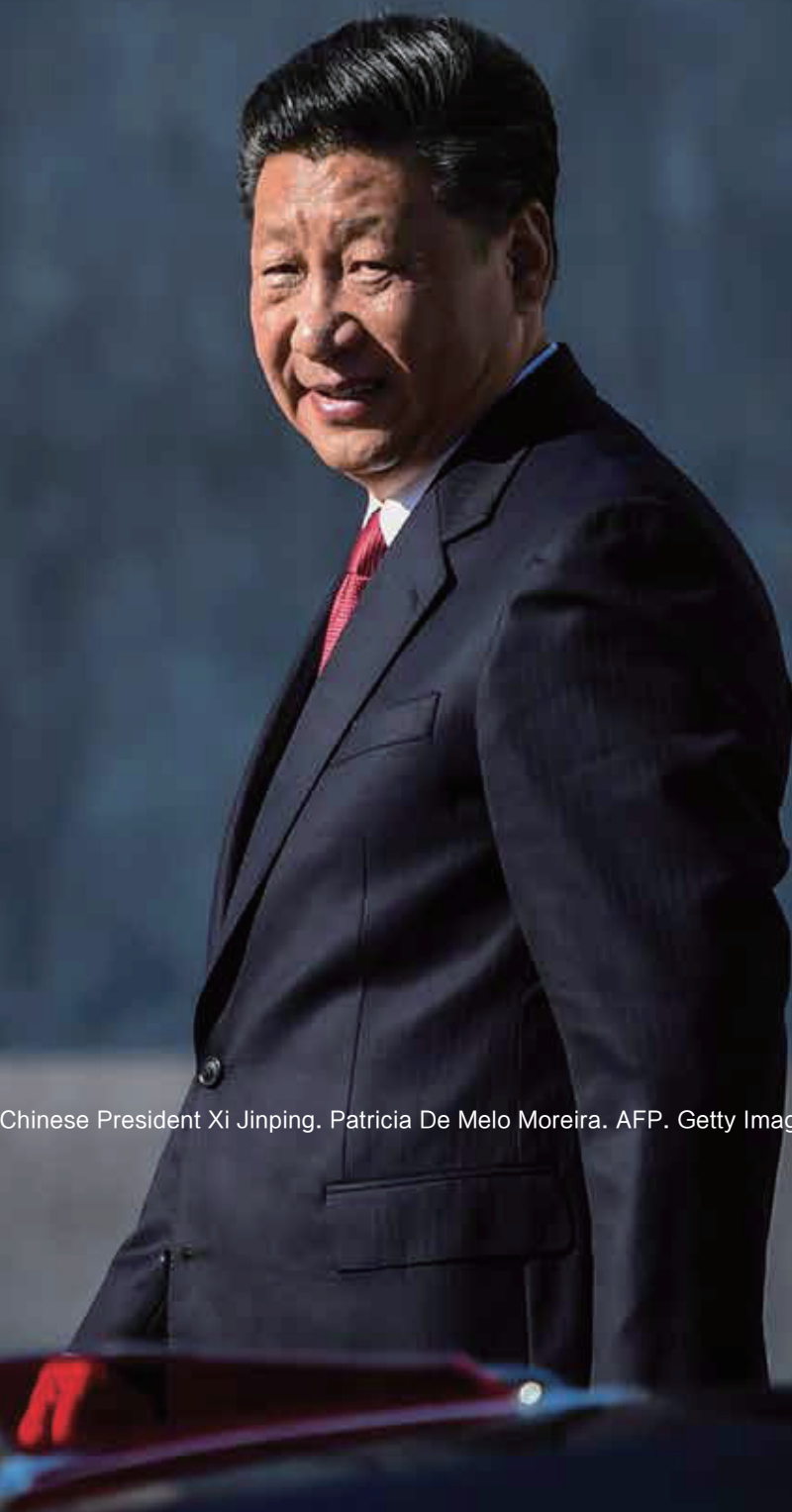
最后还有朝鲜问题。自从金正恩与特朗普举行新加坡峰会、朝韩关系开始正常化之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一直处于历史最低点。尽管如此，我们越来越明白，在美国没有进一步战略让步的情况下，金正恩不太可能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核裁军举措。同样我们也明白，尽管特朗普总统在新加坡宣布了一个新的和平时代，但美国政府仍然非常不愿意这样做。朝核问题带给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的机遇和脆弱性需要在未来一年进行仔细分析。习近平是否能够通过更积极地推动金正恩在核裁军问题上向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来遏制中美关系进一步战略恶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鉴于金正恩在 2018 年与习近平的双边接触之前与中国存在龃龉，金氏是否会听中国的？总的来说，我还是担心朝核问题难以解决的性质会导致中美关系出现更大挫折。

1. 理解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崛起

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演讲

2018年3月5日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atricia De Melo Moreira. AFP. Getty Images. 2018.



下周是西点军校建校 216 周年。英军在约克镇战败（1781）不到 20 年，托马斯·杰佛逊总统就在 1801 年的就职演讲时，决定成立西点军校。事实上，美国大陆军早在 1778 年 1 月 27 日，也就是独立战争爆发两年后，战况还不乐观时，就占领了西点要塞。因此，西点军校可谓是和这个伟大的共和国一同诞生的。在这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美利坚合众国从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发展成为了世界上的第一强国。虽然自建立以来，这个国家也遇到过无数困难和挑战，但是民主和自由之火在这里从未熄灭。

美国建立之时，中国正处于她最繁荣强盛的时期。乾隆皇帝在执政长达 60 年后，于 1799 年去世。他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 61 年后，卒于 1722 年。在康乾盛世，中国的领土几经扩张、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拥有全世界百分之十的土地，百分之三十的人口，经济总量几近全球的三分之一。

美国在 1784 年时就有意与中国建立领事关系，但被乾隆皇帝婉拒。两国直到 1844 年签署《中美望厦条约》时，才算是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那时的中国已经遭受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不到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再次败给英法联合组成的侵华远征军。而两次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百年耻辱”的开端，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从 1918 年开始，我们骄傲地成为了美国的盟友。我们的历史，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历史，相较于中美而言都很短。当然，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其历史可追溯到六万年前，并延续至今。

1781 年，由于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在约克镇取得全面胜利，英国不仅失去了这些殖民地，同时也失去了像乔治亚州萨瓦纳市这样的英国罪犯流放地。在 1783 年的《巴黎条约》之后，英国海军开始重新使用詹姆斯·库克 13 年前绘制的航海图，并于 1788 年在如今的悉尼建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罪犯流放地和欧洲殖民地。

中国，由于其地理位置之相近、幅员之辽阔，一直在澳大利亚的国家民族想象中赫然耸立——正如今天中国在全球想象中日益突显一样。尤其是在五年前，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他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不断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国家任务之一。

习近平，在团结党内重要领导集体共同探讨国家的未来时，对中国的历史深表关注，认为中国的历史为其未来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中华民族对汉唐宋明清以来的历史成就的自豪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中国的领导人在回视历史时会小心谨慎，戴着玫瑰色的眼镜，选择性地略去一些可能会给当今的中国故事带来更多问题的部分。不过话说回来，中国领导人也没有错，毕竟其他国家也是这么做的。

尽管如此，对那些专业研究中国未来发展的人而言，包括在这所优秀军校里学习的你们，必须要

花功夫理解中国的历史，理解中国对世界的看法，理解中国如何认识自身在复杂的 21 世纪中的命运。

这也是为什么在学习中国语言、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长达 40 多年后，我依然选择在牛津大学开始专门研究“习近平的世界观”。我很明白这将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虽然一股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的激流正在改变中国的未来，但中国历史同样是影响这个国家未来走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在过去的 40 多年中，我曾以学生、官员、外交官、国会议员、外交部长和国家总理的身份去接触和了解中国；而现在，我又作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来了解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机构从 195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开始接触中国。

对我而言，了解和学习中国是一生的志业与毕生的旅程。

对于将要成为美国下一代军事领导人的你们而言，这也必将成为你们一生的旅程。

我认为，对于你们的专业培养而言，没有什么比去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想法、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去探索世界应该如何更有效地与他们沟通，更重要的了。这些对于贵国未来的政治领导、企业领导以及军队领导都同样适用。因此，我鼓励大家不断努力去了解中国，学习中国，读懂中国。

定义习近平治下的中国

习近平的政治权威

要很好地了解中国对世界的看法，首先要知道中国对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未来的看法。习近平处于中国政治系统的最高位，但是他如今的影响力渗透到各个层级。五年前，我曾说，习近平将会是邓小平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可是我错了。现在看来，习近平可谓是从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领导人。我们可以从各个层面看到这一点。他在全党掀起的反腐倡廉运动，不仅帮助他肃清体制内的腐败，同时也帮助他清除了政治对手。

虽然一股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的激流正在改变中国的未来，但中国历史同样是影响这个国家未来走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五年前，我曾说，习近平将会是邓小平以来中国最强大的领导人。可是我错了。现在看来，习近平可谓是从毛泽东以来中国最强领导人。

这是一份令人生畏的名单：

薄熙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周永康，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

徐才厚，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郭伯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令计划，原中央办公厅主任；

孙政才，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在 19 大之前落马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以及不久前自杀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阳。

脆弱的人可看不了这份名单。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权力交接的暗潮汹涌。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政治手腕的高超与强硬。

习近平从来都不是政治新手。他自小长于政治世家，对于中国高层政治，耳濡目染。虽然出身红二代，但他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在文革期间，被牵扯进血腥的政治案件中，举家受到牵连。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习近平司空见惯。他亲身经历，受到锤炼，这些经历不仅教会了他如何在党内生存，也教会了他如何在政治斗争中获胜。正因为此，他向世人证明了，他是这一代最强的政治家——在一系列政治斗争中，他运筹帷幄，一个个消灭政治对手，巩固政治权力和地位，大获全胜。

这种胜利的外在表现，便是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和十三届全国人大决定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和宪法。对于习近平之前的领导人而言，如此待遇往往在他们正式离开政治舞台后才享有。而对于习近平而言，这只是他漫长政治生涯的开端。

习近平非凡政治力量的进一步体现是政策决策机构的高度集中。习近平现在兼任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以及研究重大政策的多个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

习近平位高权重的第三个表现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不少中国政治分析人士在争论在这些人中到底有多少习近平的忠实追随者。我的论点很简单：对习近平而言，目前的人事安排，远比十八大后他刚接手时，更让他感觉得得心应手。

此外，他的好友、同事王岐山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这更加突显了习近平在关键岗位上任贤选能的卓越能力。王岐山已经过了中共惯例上的退休年龄，但是这并不能妨碍他被留下担任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的“当然”成员，正如昨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媒体报道所展现的。这一决定也体现了习近平充分信任王岐山有能力帮助解决好当前中美关系的复杂问题。

习近平不可动摇的领导力的第五个表现在于取消 82 宪法中规定的国家主席两届连任限制。现年 64 岁的习近平在作为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及中央军委主席第二任期结束后将会是 69 岁。鉴于他家族的长寿基因（习父享年 88 岁、母亲现年 91 岁），以及中国高级政治领导人普遍长寿的特征，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无论以何种方式，习近平都会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带领中国进入 2030 年代。

因此，他的个人形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同时也将在 21 世纪世界史上，赫然耸立。

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习近平治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重回康乾盛世。

最后，习近平本身的性格品质也是他政治权威的根源之一。那些曾经见过他或与他交谈过的人都认为，习近平才智过人，对中国和世界历史有深刻见解，而且有深刻的世界观明确清晰地指引他向何处领导中国。

习近平成为中国领袖绝非偶然。他生而为此。

毕生知识“软件”的积累，结合政治系统“硬件”条件，构成了中国这个国家的高级政治领导的基本才能和品质。

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取决于其各自未来的选择，习近平可以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合作者、竞争者，也可以是对手。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教训，也让中国政治体系内的一些人记忆犹新，因此他们也对习近平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持保留意见。

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争论的重要话题。中国很快开始大规模管控社会媒体的有关言论。《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详述了修改国家主席任期制度只是将宪法的内容和党章内不对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加任期限限制的内容相统一。《人民日报》的社论还一再强调，对宪法的修改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对于党内那些一直反对习近平的“沉默的少数派”而言，无论他们是从哪方面对习近平的领导有所不满，都会拿修宪一事当靶子。然而，如果轻易得出“这些人很有可能在可预测的未来推翻习近平政权”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根本上的错误分析了。但是，如此修宪，的确可能使得习近平在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不利事件时，难辞其咎。如果一个人成了“万能主席”，对于他的政敌，或异见人士来说，无论他是否应该对某一个具体问题负责，他们都能轻易地把任何错误归咎到他的身上。

这些问题可能包括误算或意外后果，可能来自朝鲜半岛、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国债务危机，也可能来自难以管理的环境污染问题，或竞争力丧失、大规模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造成的失业问题所引发的社会动荡。

然而，对于如上问题或其带来的“临界点”，习近平对于党和国家的安全和情报机构的全面掌控能起到防范作用。习近平的追随者已经遍布中国安全网的各个重要位置。中国武警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国安系统也通达全国，技术先进，人数多过解放军。

我们永远不该忘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不仅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而且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枪杆子来维持政权。对此我们不必矫情。要明白这只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特点之一而已。

习近平的政党观

除了在党内建构与巩固个人权力之外，习近平是如何看待中国政治体制未来演变的呢？在此我们要再次提到邓小平在 1978 年 12 月 18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复出后的中国政治转折。

西方社会的多数人都默默假定了中国这 40 年来，逐渐接受了全球自由资本主义体系。

当然，很多人也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中国经济，开始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减少了国家对经济的掌控。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也假定改革开放鼓励自由民主，从而会慢慢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力量、创造一个更多元化的政治环境。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规模的、新加坡式的“指导式民主”体制。

尽管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算是当头棒喝，西方社会依然认为，即使中国不转型成一个典型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也正在向一个大体上更加自由的政治体系发展。如此观点，看来是有失偏颇的。

许多学者都忽视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党内就构建多元化政治系统进行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是否应该向西方民主化党派转型的讨论。中国人对 90 年代初苏联的解体都十分敏感，他们也见证了中东欧国家进行的民主化转型。

不少研究小组就此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一些受信任的外国学者也参与其中。我记得我也曾参加这些讨论。我还记得，中国的同事曾在 2001 至 2002 年间告诉我：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会进行任何系统

性的改变，而会维持中国共产党一党制。当然，和毛泽东时代的集权主义相比，中国的政治系统不会那么的专制，但本质不会变。

理由很简单。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最根本利益在于如何长久执政。在他们的列宁主义世界观里，既然革命胜利了，为什么要自愿向别人让权呢？

此外，中共亦认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领导，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领导，中国会分裂成几个争端不断的部分。纵观中国历史，如此分裂割据是大大不利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依然会保持其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

平心而论，这些讨论的终结是习近平上任前十多年的事情了。习近平的崛起并不简单意味着权威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体制里胜过了自由民主。这个争论早在十多年前就结束了。相反，这应被视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在巩固一种特殊的威权形式。

我认为这种新兴的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有三个明确的特点。第一，党的权力和权威不容置疑地高于国家行政体制。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党组织的角色地位被狭义地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而具体政策的决策权逐渐向国务院机构转移——这是朱镕基总理任内的重要改革之一。

但现在的情况不再如此。习近平意识到，如果不让党组织对实际政策决策产生结构性影响，那么党的地位就会逐渐边缘化，直到消失。习近平充分相信党的历史和未来。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他已经开始果断干预、扭转这一趋势。

“新权威主义”时代的第二个定义性特征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地位超过了实用主义政策。在过去的40年中，我们一直被告知中国的执政理念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过去了，至少在经济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比“中国特色”少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中国，“中国特色”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委婉说辞了。

似乎很少有人真正看到习近平智慧的核心部分来源于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学者的身份。这源于黑格尔“‘正反合’形式”的辩证法；也来源于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的矛盾说”。两者结合形成了习近平知识“软件”的核心部分。2013年和2015年，习近平两次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集体学习，也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对这一方法论的重视。作为一个辩证学者，

习近平的崛起并不简单意味着权威主义在中国的政治体制里胜过了自由民主。这个争论早在十多年前就结束了。相反，这应被视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在巩固一种特殊的威权形式。

习近平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转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同时，他也会直观地了解到这些新力量将逐渐给这个列宁主义政党未来继续执政带来哪些挑战。

习近平和其余的中央领导人都了解发展经济学。他们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当然也是知道国际研究成果的：一旦人均收入超过一定的界限，人们对政治自由化的需要几乎会普遍出现。因此，这些领导人都明白这一深层矛盾——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发展重点目标与持续收入增长引起的对政治自由化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对这一矛盾做出的回应是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再次强调。这不仅意味着对马列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再次确认，也是中国思想教育体制的新突破——不过这比单维度的意识形态回应要复杂得多。至少自习近平上任前的2008年奥运会开幕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国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支柱。这一点在习近平治下继续扩大发展。而且，各地那些富有经验的宣传机构，也通过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形象融入中国当代政治意识中，从而加深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重申。

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中国儒学的复兴是重建中国历史叙述、响应中国“独特”国家政治形态的一个方面。根据官方的说法，这种历史的、权威的、等级制度化的连续性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最大的区别。“新儒学”的兴起，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对当今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最好的历史印证和结合，也是中国“伟大民族复兴”复杂过程中的必要因素。

简而言之：纵观中国的朝代历史，其每每强盛都是以强大的、权威的、等级制度化的、以儒学治国为基础的。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的强盛从来都不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产物。不难推断，中国未来的国家强盛，也不会依赖于西方的政治形式，而在于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结合。

习近平的经济观

中国“新权威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尽管不如前两个明显，但其根本在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

我们都很熟悉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也同样熟悉他的另一句名言“致富光荣”，还有后来流行的“下海”和“走出去”。这些与有关意识形态的长篇大论不同的简单语言，给接下来两代在中国和海外的企业家提供了指导性意见。

从政策角度来看，中国第一阶段经济改革（1978-2012）的主要类型包括小型地方家族企业参与轻工业；低薪、劳动力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以及包括电信、宽带、公路、铁路、港口、发电、输电和

配电等由国家层面投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有关深化改革的第二阶段蓝图，通常被称为《决定》，或中国的“新经济模式”。《决定》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强调了市场的重要性，并努力实现从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到消费型经济的转型；除了部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行业，限制国有企业的整体市场份额，鼓励非公经济蓬勃发展；推进电子商务等服务业的有序开放；促进包括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一切发展都要以重视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重要的是，要去跟踪调查2013年11月以来的五年中，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列出的“全面深化改革60条”，有多少项被启动，又有多少不进反退。整个改革计划的核心原则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通过与荣鼎集团合作，推出“中国经济观察表”^①，跟踪观察中国十项核心经济改革政策的执行（都是中国经济分析界广泛讨论的话题），并据此制作“中国经济晴雨表”。

我们得出结论，过去5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仅在两个领域取得进展。首先，在创新政策方面，中国取得了可观进展，但更为关键的是，对中国在实际经济效益方面创新能力的怀疑受到挑战。其次，我们还测量了中国环境改革的进展，特别是过去两年中国主要城市空气污染的减少。然而，在十项选定领域中，至少在投资、贸易、金融、国有企业和土地改革这五个方面，中国都在原地踏步。在财政政策、竞争政策和劳动力改革方面，我们看到了中国在五年前为自己设定的改革方向目标上倒退的证据。现如今，在中国，很少有媒体称过去五年是经济改革的开创性时期。中国经济改革，至多只能说是缓慢前行。

这种情况使得将要在2018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的经济报告内容显得尤为重要。《决定》发表的整五年后，所有的分析团队都会仔细研究这次的经济报告的内容，从而去分析市场经济改革的精神是否会在未来持续蓬勃发展；或者这一精神是否会随着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重新向左而逐渐消失；或者经济改革政策，由于令人混淆的政治与政策指示，在实施阶段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又或者由于地方奖励机制的有限，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都无法积极实施改革，从而不可避免地当地造成利益集团的内部冲突；再或者，上述因事综合导向官僚主义作风的倾向。

当然，中央财经工作的领导层，都充分意识到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他们从过去痛苦的经历中知道，改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并且，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十三亿人口每年就要新增两千万个

^① 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中国经济观察表：追踪中国经济改革计划”，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与荣鼎集团合作出品 <https://chinadashboard.asiasociety.org>

劳动力，而在过去五年内，中国经济中唯一促进就业的就是民营企业，并非国有企业。

尽管如此，还有其他令人担忧的迹象。首先，民营企业中的党委书记的角色似乎得到加强。其次，中国正在就国家是否应该获得成功民营企业的股权，以确保广泛代表性及对这些公司未来方向的更大政治影响力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第三，随着反腐运动和一系列纠察违规行为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民营企业正处于政治困境当中，比如在安邦集团的董事长涉嫌经济犯罪被拘留后，中国保监会对安邦集团实施暂时接管。

如上种种又体现了中国值得信赖的独立的商业法庭和仲裁机制的缺失。这便让人忧心是否今后会出现私有资本罢工或私有资本外流的现象，从而导致国家重新实行资本管制的问题。

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尚无定论。但这是否意味着，在此问题上，已经出现一个新的“临界点”？又或者，这是否是中国为了保持内部系统平衡而选择的“政左经右”模式？无论如何，接下来的12个月对中央财经领导们而言尤为重要。

习近平治下中国的世界观

七个核心重点

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专家试图去了解、定义其他国家的能力、战略和世界观时，总会遇到问题。由于思维惯性，我们总会不自觉地认为一个国家的行为在世界领域中的“外在”表现是独立的现象。事实上，一个国家的世界观不仅是其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的共同产物，也是其军事实力，以及其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对比的共同产物。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本演讲中不断强调中国内部驱动其世界观发展的因素。我们需要牢记，和美国策略制定一样，那些决定中国国际策略的人，也参与国内事务。外交与内政、国际和国内，不再明显区别。因此，理解中国领导层面临的国内要事，是理解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新兴模式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

在我看来，新时代中国的 worldview，可以被理解成七个同心圆。首当其冲的便是列宁主义的中共

党，和其持续领导中国的强烈意愿。这个事实需牢记。这一点和西方政党的世界观完全不同，西方政党在尽可能保持选举权的同时，也很可能能够理解在选举过程中，每个政党的政治话语权都会有起有落。

国家统一

就中国领导层的核心利益而言，第二个同心圆是国家的统一。

在西方看来这个说辞可能十分过时，但仍然是中国极其关心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一个国家长久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西藏、新疆、内蒙古和台湾是中国安全利益的核心部分。这些区域各自代表了外部和内部安全因素的汇合点。在中国看来，西藏是中国与印度的战略关系的核心因素。国内伊斯兰分裂运动令中国担忧，认为伊斯兰世界日益怀有敌意，而新疆恰恰是面向伊斯兰世界的门户。尽管几十年前中国就与俄罗斯解决了边界问题，但内蒙古仍然是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战略关切的主要来源。而长期被视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母舰的台湾，从中国的战略角度来看，不仅不利于中国建立更安全、更可管控的海洋边疆，也影响了祖国统一大业。这些来自中国内部的安全挑战，将会是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问题以外，中国最核心、最重要的安全关切。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个同心圆是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政策遗留问题的解决，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之前已经详细介绍了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境。而领导层同样还面临着一系列在媒体上广泛传播的水、土地和空气污染以及食品安全的问题。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悲剧代价就是环境恶化。的确，中国过去一直认为环境不过是经济发展的“外部成本”，而这正是造成中国环境快速恶化的主要原因。中国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当然，中国的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与全球气候安全的未来以及地球的未来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如果中国像美国和澳大利亚一样未能履行温室气体减排的承诺，那么到本世纪的最后 25 年，等你们领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去学校时，气候问题将会是全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从当下中国的世界观而言，强大的经济和干净清洁的环境共同代表着共产党未来的政治合法性。

因此，这些关于清洁水源、可用土地、未被污染的渔业资源、清洁空气，以及就业率增加、生活条件提高、控制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而言是日常最要紧、最艰巨的挑战。

中国的邻国—确保中国亚欧边境地区安全

这个同心圆的第四层涉及中国的 14 个邻国。邻国在中国的战略记忆中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历史上，无论是 12 世纪蒙古族从北部入侵，还是 17 世纪中期满族人从东北部入关，以及后来英法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及日本从东部占领中国的领土等等。邻国一直是外国势力入侵、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最主要途径。

对于如何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传统的战略思想形成了深刻的防御性观念。但是，纵观中国历史，这种防御性措施并不是一劳永逸、永远有效的。长城未能为防止外来入侵提供安全保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基于这些原因，中国的现代战略思想探索了不同的方法。首先，通过政治和经济外交，中国希望与所有邻国保持积极、包容、和平的关系。

除此之外，中国也在不断开拓自己的战略纵深。中国与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周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合作：上合组织，亚信峰会，一带一路倡议（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连接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等等，都是明证。

中国的战略需求明确：巩固与邻国的关系——这意味着加强其在整个欧亚大陆的战略地位，从而巩固中国的周边安全。

中国的周边海域—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

第五个同心圆，或可和第四个归为一类，是中国与东亚以及西太平洋相接的海域。

与中国的陆地边域不同，中国的周边海域可谓是危机重重。中国认为自己在东海、南海的主权问题一直受到威胁。东海和南海问题现在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和台湾问题同等重要。中国也将该领域视为美国与其盟国（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对中国形成的包围圈。除此之外，从根本上，中国还是首要关注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

中国对此的战略回应十分清楚。中国在其声明中反复强调，美国的联盟体系是冷战遗留产物。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拆散美国的联盟。中国对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最深层的战略关切在于，一个统一的亲美的朝鲜半岛与其土地相邻。

除了以上的战略性回应之外，中国也不不断加强自己的海空军力量。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军事组织、条令和力量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陆军不断缩小规模，海军和空军力量不断扩大。

目前，中国的海空力量已经部署到了中国南海。中国海空力量的不断壮大，伴随着中国不断发展的陆基导弹部署，时刻准备对台湾问题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军部署做出回应。中国的战略性逻辑也很清晰：这一空海反介入战略，意在对抗美国对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支持、美国及其盟友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动作。中国整体的政治军事战略也十分明确：迷惑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从而使美国政府无法估算未来美国在任何与中国的武装冲突中的胜率——这也包括造成美国对自身捍卫台湾的能力的怀疑。

中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采取了相对柔和的战略，包括通过贸易、投资、资本流动和发展援助进行经济互动。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和其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是将自身变成不可或缺的经济力量。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中国这个目标的达成效果显著。从很多方面看来，这也反映了大家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测：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下去，中国有望在可预见的未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底线是：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我们的理解中，中国都已超越美国，成为东亚几乎所有国家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对于广义上的战略逻辑我们都很清楚：从经济力量发展为政治力量，从政治力量发展为外交力量，再从外交力量发展为战略力量——这也是中国的战略逻辑。

底线是：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我们的理解中，中国都已超越美国，成为东亚几乎所有国家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对于广义上的战略逻辑我们都很清楚：从经济力量发展为政治力量，从政治力量发展为外交力量，再从外交力量发展为战略力量——这也是中国的战略逻辑。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

在我想象的中国战略重点视图中，第六项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友谊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不结盟运动中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当然从中国和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的关系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

长期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被视为其全球利益和价值观的重要支柱。近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中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及贸易中又进一步加深、壮大。

在非洲，中国开建了大量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虽然这些项目中在当地都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是中国战略的卓越之处便在于其持久性和随时间适应和调整的能力。西方学者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进行了多项实地研究。有些并不乐观，但是与此相对的是，更多积极正面的故事也在发生。因此，当中国在联合国或全球多边体系的迷宫中寻求支持的声音时，其获得政治和外交支持的能力是前所未有、无可比拟的。

中国和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

第七个，也是最后一层同心圆，关注的是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未来（这其中也包含了中国对大国的关系）。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美国及其盟友构建了战后基于自由国际规则秩序的基础结构。这一点不难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中诞生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中看出。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以及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也都是这个全球秩序的具体体现。

美国也通过在欧洲建立北约、在东亚建立双边安全联盟的方法捍卫自己在全世界联盟体系中的地位。通过这些手段，即使是在冷战期间，美国依然是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然而，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巨大变化和挑战的时期。

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其国内合法性问题上正在面临挑战。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开始挑战美国军事区域性的主导地位。中国在现有多边体制之外也建立了新的多边机构，比如亚投行。中国还在继续扩大其在欧洲和亚洲的战略辐射和经济贸易范围。同时，习近平也明确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会将当前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复制到未来。

中国不断表示，现在的自由国际秩序是二战后西方战胜国以及殖民帝国建立的。不过中国并没有明确表示她会对未来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做出什么改变。

在中国的深层政治意识中，一个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比起简单混乱是更可取的。不过，我们要认识到，替代“混乱”的“秩序”不一定是美国的秩序、也不一定是美国建立的

在中国的深层政治意识中，一个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比起简单混乱是更可取的。

自由国际秩序，中国所期望的新秩序是自己参与共同领导的全球秩序。

中国对未来全球秩序的期待当然是与自己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相吻合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会想要改变一些东西。目前看来，中国究竟想要改变什么并不清楚，也无法得知国际社会是否会认可这些改变。比方说，这可能将对以日内瓦三项国际条约和人权理事会为基础的国际人权秩序产生影响。这也将对包括世贸组织在内的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影响，特别是美国挑起贸易战之后。由于中美两国的国内政治都在不断变化，未来的国际安全秩序也正处于极大不确定当中。

关于中美是否会走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辩论是很多的。同样，现在也有很多关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辩论——该理论认为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英国的全球收缩政策造成了战略真空状态，然而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强权后却未能接替英国扮演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角色，使世界陷入另一种混乱状态。

我深信，我们必须避免这两个陷阱；我们必须用智慧来开辟另一条道路。

总结

让我们去学习和了解中国的理由太多了：她有非凡的文明和文化；有着 4000 多年积淀的智慧；其美学传统的世界影响也是无可估量的。中国丰富悠久文化历史让我们很容易就会迷失在汉学的世界里。但是，要理解中国的崛起，我们须从“新汉学”的角度重新审视 21 世纪的中国。

我们需要的“新汉学”不仅研究中国传统和历史，也要研究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在区域和世界中的地位 and 角色。更要具备对以上的所有方面进行综合体会的全局观。

我们需要一代能够充分理解中国综合现实状况的领导人。为此，我们需要睁大眼睛、开放胸怀，勇敢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威胁、新的可能性，不断在新的领域互相协助、合作，从而使那些未来与中国打交道的人充分理解中国。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找到创造性道路，既可以维护和平、维护稳定、有效避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又能保留我们坚守的国际公约，国际秩序，和普世价值观。



2. 习近平、中国和全球秩序：2018年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影响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讲话

2018年6月26日 星期二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during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ference in Beijing.

L. Etienne Oliveau. Getty Images. 2016.

2018年6月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结束，这是自2012年11月习近平当选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以来第二次召开相关会议。上一次举行会议是2014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正在全球参与的重大问题的考量中，外事无小事。

此系领导层全体参与的权威会议，旨在整合中国官方对国际趋势的分析，并评估中国应如何预估并响应国际趋势与自身利益的碰撞。最近这次会议由习近平主席主持，与会人员有政治局常委全体，前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以及所有政治局委员，还有来自外交、安全、军事、经济、贸易、金融、网络和情报界的代表，以及中央智囊团的几乎所有成员。

这次会议值得所有研究中国国际政策领域的权威人士关注，因为习近平在会上所做报告中有关于中国全球地位的新指示。

但会议并不公开。三年半前，央媒只报道了部分会议内容，这次也差不多。不像当今的白宫，中南海不会每半天就走漏信息。因此，我们常常只能通过蛛丝马迹，解读会议的意义，来判断哪些讯息是新的，哪些似新非新，哪些只是旧事重提。

新在何处？

2018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和2014年的会议相比如何？2014年的会议正式宣布了过去30多年奉行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一个推行自信、独立、积极的对外政策的新时期的开始。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变化反映了习近平更集中的政治权力；也反映了中国对美国全球势力相对衰弱的深刻理解；而且如果中国在地区内寻求军事扩张，美国不会轻易在军事上与中国冲突的战略判断。这种变化也反映了中国的结构性结论，那就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已经是不可或缺的经济大国，从而使中国开始能够实现经济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发展。这种变化也是习近平个人领导气质的体现，他无法忍受中国体制内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而国际社会对他这种领导气质也感到自然，已经习惯了。

那些密切关注这些事件的人也记下了这一系列事件的重要性，习近平时代的外交跳出了中国传统的战略框架——对此密切关注的人一定注意到了与此相关的系列变化的重要性。自2014年的会议以来，一系列的发展都指向中国的国际政策方针、内容和方向上的整体性变化。在2014年到2016年间，中国夜以继日填海造岛，快速扩展了自己在南海的军事地位。中国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的概念，并把它转

变为一个上万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及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倡议，吸引了欧亚非 70 多个国家。中国组织筹建了第一个非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的大型多边发展银行，与大部分发达国家签约。

中国第一次成为了多边外交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发起组织者，也组织了很多外交活动，不仅关注在东亚的直接利益，也积极参与到了其他倡议中，比如 JCPOA(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要知道过去中国，常常不愿涉及非本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中国还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吉布提（有大约 5000 名士兵）建立了海军基地，参加俄罗斯海军在日本海、地中海，甚至波罗的海的军事演习。

在 2018 年 3 月的最近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决定建立首个国际发展合作机构，来管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蓬勃发展的援助计划。当然，中国的国家金融机构，国有企业，还有混合所有的投资基金，已经在世界各地运作。

如果上述活动都在 2014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之后突然开始的，那就错了。事实上，不少活动始于习近平 2012 年接任总书记，还有一些从胡锦涛任期后半就开始了。我想说的是这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要么启动，要么加强，要么合法化了这些活动。简言之，中央指导中国外交在世界各个舞台去博弈，去斗争，去领导，是一个新现象。

此外，我有时依然看到，西方有些人不切实际地认为，这些改变并不是出于中国的周全战略——这些人显然是对中国官方形成的明确的政策目标选择视而不见。我们的中国朋友不像西方政界一样痴迷关注新闻头条。他们思考问题很谨慎，观察世界很仔细——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观察“国际关系的潜在历史趋势”。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细致的内部反思和考量，在必要时达成共识，从而设定新的方向。

这确实是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目的所在。会议总结全和系统性地对世界进行分析，并系统性地提出相应对策。这是中国政治系统在政策分析、实施和审查这个系统中的重要部分。该系统覆盖中国的内政外交。这是中国体制的一大优势，也是很大的缺点，因为纠错代价很高。一旦得出的结论被证明在分析上存在缺陷，或在实践中不可持续，想掉头来过就要花费很大代价。

那么 2018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带来什么变化呢？是大抵相同，还是有所加强？或是仅仅是内容和语气上的变化？答案是兼而有之——我们看到一个连续性的变化。

外交政策中党和意识形态的新作用

首先，据会议的新闻报道称，党在外交中处于绝对中心地位。这并非新提法，但强调的语气加重很多。

最近，国际政策官员如经济官员一样，越发需要技术性精英——就此而言，外交政策圈正向经济政策圈靠近。所以习近平要救党：一方面反腐倡廉以正党风，一方面极力把党拉回政策决策的中心——这是习近平治理下的中国的一个趋势，习近平重点关注如何打击腐败的不良风气，同时整顿不相关的政策。

习近平一直担心，党会因为现代治国理政的主要政策辩论的技术复杂性而被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的趋势是：理论盖过实践，党的权力大过国家机构，以及政治形态意识的重要性超过专业性政策。习近平并不想带领党被“千刀万剐”，而党正与一系列市场经济，社会开放和海外影响所一起释放的政治力量相竞争。

习近平想要让中国共产党来反抗西方历史的趋势，以此来证伪福山的论点——“历史的终点是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胜利”，并长期保持列宁主义国家的有效手段，来确保中国在国内和国际挑战中的主导地位。所以大会报告详细讨论了这一点，用报告中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为了防止我们漏掉重点，习近平也强调了“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要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落实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驻外机构党的建设，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驻外机构管理体制”。

会议同时也强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这样就会让习近平思想从内政走向外交。在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适用整个中国体系，但通常指向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但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用于外交，其意义将发生变化。

这似乎意味着，现而今中国外交开始让意识形态世界观凌驾于过去几十年我们看到的简单政策实用主义指导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今天中国的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外交政策愿景，似乎是超越简单的国家

习近平想要让中国共产党来反抗西方历史的趋势，以此来证伪福山的论点——“历史的终点是西方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胜利”，并长期保持列宁主义国家的有效手段，来确保中国在国内和国际挑战中的主导地位。

利益最大化。这不是在简单重复自习近平上任以来我们就很熟悉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现在这个阶段，新的意识形态使命可能刚刚萌芽。

为了避免对这一点有任何疑问，前外交部长兼国务委员杨洁篪，现任中央政治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委员办公室主任，明确提到了这次会议的思想意义。下面引用杨主任的发言，非常值得一看——他表示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

“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上来，进一步开创对外工作新局面。”

对于关注国际外交政策的人来说，这段表述可能听起来有点晦涩难懂。这是国家内部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但如果看不到其中的新东西，那我们将是盲目的。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概念化甚至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更具马克思主义色彩，抑或更具民族主义色彩？中国是否会寻求更积极地推动其发展模式——“专制资本主义”，将其作为世界的典范，以与西方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竞争？这段表述是否是一个尚未成形的中国世界观，该世界观最终将围绕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目前较为笼统，却已经被大量研究的概念而形成？

还是说这段表述只是希望中国目前的外交机构变得更加充满活力、想象力、创造性，甚至是更强大有力以让未来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更符合中国的设想，而不是让中国永远当“价格接受者”，去接受他人在别处已经制定好的规则，尤其是在法治、人权和民主等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中，现有国际秩序一直给中国国内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带来挑战。

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自信——历史将有利于中国

2018年6月的会议还有第二个要素，是从第一个要素中延伸出来的。那就是习近平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该历史观的基础是辩证学家所说的事物统一、对立、融合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不断进化。习近平认为，这种历史观反过来又产生了既定的“历史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既具备规范性又具备预测性。

这可能听起来像老式的马克思主义。但的确如此。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思想都已经被这个概念框架

所塑造，他们用这个框架来解释、回应自己所定义的科学、客观的事实。习近平沿袭了这一传统。要知道，他已经召集政治局成员进行了专门的学习，了解过去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根据会议报告，习近平建议“不仅看现在国际形势怎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大势。”此外，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指出，树立正确的大局观，“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习近平总结说，“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发展从来都是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

所有这些话看起来都非常晦涩难懂。但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表述中，这可能有如下意义。首先，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不是随机出现的。其次，这些改变反映了某些不可改变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规律。第三，中国外交政策的开展要通过这种辩证法的视角来准确理解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应对。第四，将上述话语联系当前实际，意味着全球秩序正处于转折点，美国和西方相对衰落，而有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恰好使得中国崛起。

用习近平自己的话说，这是“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习近平将当前时期称为中国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这也是党的使命所在。虽然这本身并不是一个新表述，但习近平表示，党的使命是延长这一时期。为此，他呼吁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中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

换句话说，当今中国处于有利时机。当然前路依然艰险。但是，对历史的辩证分析使中国得出结论，美国和西方面临的阻力更大，在其国内（在其特定的政治体系中）遇到的矛盾也更大。在美国和西方开始竞争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内和国际整体环境反而变得更好。这种观点再次表明，历史合力会更多地青睐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如果你认为这听起来更像中世纪神学而不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那也是情有可原。而且人们都猜测这与现实中具体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们常常忽略了一党专政国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国家是如何理解现实的——这其实非常重要，意味着系统如何与自身对话，以及决策层如何相互沟通。

重要的是，习近平向国际政策精英传递出一种极大的信心。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愿意这样做，而且还因为中国领导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这一理论阐明了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某些不可改变的“规律”，证明了历史的力量现在有利于中国。此外，这是对更大的国际政策活动的呼吁，而

不是害怕特朗普崛起而退缩。换言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历史的巨大趋势，或者用苏联老话来说，“相互作用的合力”，正在推动中国的发展。

迈向更锐利的中国外交

2018 年外事工作会议的第三个要素是，加强驻外机构的建设，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驻外机构管理体制，来实现习近平的外交工程。习近平认为“外交事务机构和机制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呼应了前文提到的“党建”在国家外交政策机构中的核心地位。

在人事问题上，习近平提醒国家外交官们，他们首先是“党的干部”。这颇有意识形态的复古感。事实上，我们很久没有听到中国外交官称他们的上级为干部了。但我不确定在过去的 35 年里是否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引用新华社的报道：“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习主席呼吁建立一支忠于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的强大外交人员队伍，政治立场坚定，专业能力强，行为受到严格纪律规范。他呼吁外交干部加强思想和技能培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整体素质……”

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外交官将以新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也许如此。据报道，长期以来习近平对某些外交政策部门的反应迟缓感到沮丧。因为中国的战略挑战和机遇往往迫在眉睫，也稍纵即逝。这再次说明，未来需要更加奋发有为的队伍，来实现领导人的政治和政策愿景。

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改革

第四，2018 年外事工作会议产生的最具实质性的新理念是关于全球治理的说法。

习近平在 2014 年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到，为架构未来国际秩序的努力即将开始。他当时没有详细说明。但是，针对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国际秩序、国际系统、全球治理，中国内部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

当然，这些表述也意味着英语中既有不同也相互重叠的意思。从广义上讲，在中文里，“国际”或“全球”秩序一词一方面指的是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二十国集团和其他全球多边或多边机构；另一方面指的是美国依据自身理念对国际安全的定义而执行的全球体系。“国际体系”一词往往指的是上述国际秩序的前半部分——根据国际条约法运作并试图在共同主权原则基础上管理全球公共领域的多边机构的复杂网络。而“全球治理”倾向于指的是上述“国际体系”的实际表现，无论是好还是坏，

有效还是无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8年的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将是中国“基于公平与正义的概念来引领全球治理体制改革”。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对我们这个重要问题的最直接、最无保留和最广义的陈述。

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中国敏锐地意识到当前多边体系的众多功能已经失灵，也看到美国已经大面积脱离体系：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协议；退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公然蔑视难民公约；挑战WTO的根基。

我们知道，大自然讨厌真空。国际关系更是如此。18个月前，也就是特朗普刚当上总统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就气候变化和自由贸易问题对特朗普总统的回击。如果中国确实认真地希望领导全球治理改革，那么她对各种多边机构的态度将与历史上美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以日内瓦的人权理事会为例，中国乐见其衰。但请注意，当前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

在这次工作会议上提到“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改革”绝非偶然。这也反映了中国在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下，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机构中的日益奋发有为的外交活动。因为中国开始寻求朝着更符合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方向来重塑这些机构及其文化、工作方式和工作人员。正如我之前所写，中国不仅仅抵制当前国际体系的规则、制度和文化所带来的与马列主义价值不相容的“西化”压力，如今的中国领导层似乎决心要利用其新的全球力量，来重塑国际体系中那些最可能给中国国内带来问题的体制机制。

至于习近平所说的公平正义原则是指导中国全球治理改革的核心原则，这些语汇意味着中国倾向于建立一种更为“多极”的国际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美国单方面的声音会有所减少。中国已经在非洲、亚洲部分地区和拉丁美洲建立了强大的联系来支持这种体系。中国战略话语中的“多极化”意思就是在稀释美国在战后国际体系中的力量。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将是中国“基于公平与正义的概念来引领全球治理体制改革”。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对我们这个重要问题的最直接、最无保留和最广义的陈述。

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

为了避免任何人对中国改革全球治理的意图过于乐观，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原则进行了描述，并提出十大治理原则：中国必须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习近平表明，中国的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当然，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也都是如此。

当然，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对其核心国家利益的定义也不停演进。比如，这些核心利益，现在包括南中国海。十年前，这不是中国官方声明中定义中国核心利益的一部分。事实上，对于任何国家而言，“核心国家利益”的概念会逐步发生变化，并将由当时的政府来定义。

结论

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2018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的精神将如何转化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各种实际行动。如果以 2014 年会议为先例，我们将看到中国外交政策活动的高峰期。然而，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还有待观察。但我们看到，中国的世界观逐渐系统化，并将内政外交通盘考虑——这一愿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深刻见解。

我们会看到变化首先发生在全球治理机构，但变化不会局限于这个领域。2018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报告表明，我们也将在中国的双边关系、中国与区域机构的联系，以及中国对大国关系的应对等方面看到变化——中国可能用越来越直截了当的外交方式来处理上述议题。

但我们看到，中国的世界观逐渐系统化，并将内政外交通盘考虑——这一愿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深刻见解。

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是确定未来想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制度和治理架构。国际社会要认真对待中国的邀请，与中国对话，坦诚而直率地讨论地区和全球在未来“全球命运共同体”中究竟想要什么。

欧盟想要什么？东盟想要什么？东亚峰会想要什么？非盟想要什么？美洲国家组织想要什么？海湾合作委员会想要什么？无论特朗普是否当政，美国究竟想要什么？

以及在这样的对话中，《联合国宪章》、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各种区域组

织的章程中所确立的价值观应如何得到维护？

当前，全球秩序的未来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中，部分是由美国最近的态度引起的，部分是由中国崛起造成的。中国对未来似乎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国际社会也是时候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了。

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是确定未来想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制度和治理架构。国际社会要认真对待中国的邀请，与中国对话，坦诚而直率地讨论地区和全球在未来“全球命运共同体”中究竟想要什么。





3. 中美关系风雨飘摇：贸易、 投资和高技术的新战争

在美国亚洲协会硅谷中心的演讲

旧金山 加利福尼亚

2018年9月13日

Smart City Shanghai. Dong Wenjie. Getty Images.

历史告诉我们，选择何时作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反思、感知或预测某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时刻会在何时到来。当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时，往往已经是“马后炮”——这对于身处现代公共政策领域的我们来说没啥用处。

在一个多月后，我们将迎来发生在 1918 年的那场“终结所有战争之战”的百年纪念日。这场发生在曾经统治十九世纪世界的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彻底改变了二十世纪历史的面貌。

一个世纪之后的 2018 年，我们似乎正一步步走进另一场战争——一场缓慢发生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主导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大国之间，即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战争。从贸易战开始，发展成投资战，然后将转为一场新的“技术战”，因为中国和美国正在努力抢占新技术的制高点，而这些新技术对二十一世纪各经济带来的要么是推动，要么是破坏。

这场战争是否或何时会变成另一场“冷战”，尚难定论。这场迅速展开的新经济战争所释放出的不可预测的力量，是否或何时会引爆某种形式的军事对抗，更是言之尚早。

但问题在于，这种观点直到最近，在主流公共政策领域中还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已经属于可以想象的范畴，虽说不太可能，也非不可避免，但却无疑有了想象的空间。

没有人可以自信预测这场冲突将会如何收场。诚然，我们似乎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时代，从之前四分之三个世纪由美国主导的具有确定性的战后秩序时代，过渡到一个不太可预测、更加复杂、更具争议性的未来全球秩序时代。当然，这种变化的绝对支撑点在于迅速变化的中美关系。

历史很少重演。但是借用马克·吐温的话来说，我们确实能够感受它的韵律和节奏，并且这些韵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重新出现。正因为如此，没有人预测到 1914 年“政治实践主义”的回归，以及由它带来的人类大屠杀。但是，在现今社会如果不认识到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当今的地缘技术这些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那么我们将是愚蠢的。而且我们如果不去探寻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管理这些正在不断变化的权力动态，去维护这些自 1945 年以来国际秩序的主要架构，例如共同维护人类的和平与繁荣，坚持开放政治、开放社会和开放经济的价值观，那我们将是一蠢到底的。

诚然，我们似乎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时代，从之前四分之三个世纪由美国主导的具有确定性的战后秩序时代，过渡到一个不太可预测、更加复杂、更具争议性的未来全球秩序时代。当然，这种变化的绝对支撑点在于迅速变化的中美关系。

中美尚未进入“冷战”

美苏冷战的典型特征是核对峙、在第三国开展代理人战争、微乎其微的经济合作，以及几乎为零的民间接触。所有这些特征都包含在一个基本意识形态分歧的框架下，即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美国主导的秩序中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

虽然当前中美关系令人担忧，但是上述特征还未呈现。两国之间仍有许多纽带在维系，但若对这些纽带的日渐磨损视而不见则是不明智的。

尽管两国间贸易战正展开，但中美贸易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关系。美国和中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合作约束了朝鲜核武器计划，尽管特朗普政府公开对合作的程度表示怀疑。

虽然中美在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的竞争不断升级，但是两国并未在第三国开展代理人战争。迄今为止，美国仍然是世界上中国留学和研究人员最多的国家，尽管美国国会和情报机构表明担心这未来对美国长期技术优势的影响。虽然中美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网络战已急剧增加，但其具体规模对广大公众仍不透明。

虽然中美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网络战已急剧增加，但其具体规模对广大公众仍不透明。

然而，在美苏冷战的所有特征中，中美间显露出的意识形态分歧最为突出。中国不接受当前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价值观，因其与中国国内的政治秩序并不甚相容。中国的领导层更为坚定现有的威权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逐步调整国内体制以适应国际自由主义原则。此外，中国的领导层还在寻求以适合中国的方式改革、塑造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领导国际秩序改革。

综上所述，我们确实该慎用“新冷战”来简单描述中美关系——迄今为止，中美并不满足美苏冷战的典型特征，至少尚未满足。但是如果在高技术领域也有“新冷战”的话，或许其已经开始了。

中美关系——消失的压舱石

现如今，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日益增长的贸易、投资和技术方面的消极因素会把我们带往何方？速度多快？特别是当这些因素被包含在日益增长的意识形态敌意、长期存在的相互间政治不理解，和不断扩大的战略不信任这些大框架之中。

历史的教训(包括一个世纪前的那些)告诉我们,当政治关系出现裂痕,当国家间的不信任变得普遍,我们会更容易受到个别事件的煽动性影响。从今天的中美关系看来,自1979年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由一代又一代人经过至少40年时间建立起的两国关系的保护层,正受到缓慢却稳定的侵蚀。

在中美关系的第一个十年,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是双方对苏联的战略不信任。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压舱石在很大程度上被中美双边经济接触的广度、深度和结构所取代。

十年后,随着中国在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而大规模进入全球经济共同体,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欢迎中国更多地参与全球经济秩序,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示欢迎。美国政策制定者与大多数国际同行一样,认为这种双边、区域和全球的经济接触将最终导致中国跨越意识形态的禁区——从传统儒家思想和近来威权型国家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信条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在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中底气十足的“利益相关者”。如今回头看,这确实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期。

又过了十年,在2012年,我们看到了习近平的崛起,中国进入了所谓的“新时代”。

2014年,习近平明确表示,当下中国在国内外都不会接受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而要改革现有秩序。

再到2018年,中国的官方表述再次发生变化:中国将要“引领全球体系改革”。在此间的五年中,我们已经看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启动,这些都是中国“新时代”展现新的全球领导力的旗舰项目。

中美关系在过去40年里走过了漫长的旅程。在此期间,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这个过程开始时,中国的经济规模与澳大利亚差不多;到中美建交50周年之际,中国可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虽然中国在威权资本主义混合模式的推动下,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变革,但是中国的政治模式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一党制的列宁主义国家。这次,我也还是为我们的中国朋友们说句公道话,他们保留这一政治制度及作为其前提的价值观的决心一如既往,从未改变。

相反,尽管天安门事件敲响了一个巨大的警钟,西方世界几十年来仍然从政治方面过分乐观地看待中国。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年左右时间里,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最终“抛去幻想”。中美关系的传统支持者,尤其是来自美国商界的的支持者,现在已经沉默了。大多数其他长久以来的支持者也一样。

美国政府、国会(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五角大楼、国务院、情报机构、工商业界(包括多个领域)、有组织的劳工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反华联盟”。事实上,这种关系的原始战略基础现在暴露无遗,浪漫不复存在。现今的关系就如同令双方都难过的婚姻。实际上,“分居”已经开始,

而且至少在科技领域，离婚程序已经开始。

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一切现正去向何方？

战略转向——几十年“战略接触”的结束与“战略竞争”新时期的开始

2018年，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中美关系的重大战略转向时期。现在两国关系的三个保护层都已经被扯掉。随着中俄间政治、军事和外交协同逐月深化，中美现今不再是反苏阵营的伙伴，而已处于对立的两个不同战略阵营中。

两国商界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其现在对这种关系的支持已经深度分化。美国企业对中国经济政策对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影响，以及政策中对外国投资者施加的条款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集体敌意。虽然中国和美国可能仍然选择在G20议程的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但2009年的那段太平日子早已远去。那时中美和其他西方政策制定者团结一致，紧盯着全球金融危机，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令人不安的现实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间的关系正处于漂移不定的状态。支撑着两国共同利益的大部分共同假设，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共同价值已经不复存在。正如老一代的两国关系监管人——他们指导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公理是强调全面接触能够给双方带来压倒性的共同利益——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中美关系现在严重缺乏共同战略目的，因而也缺乏一个共同战略叙事，因为“叙事”最终不能对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撒谎。这一切进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当双方都撤退到各自的战略角落，以便考虑如何最好地击败对方时，中美之间是否还有可能存在一个共同的叙事。

令人不安的现实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间的关系正处于漂移不定的状态。支撑着两国共同利益的大部分共同假设，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共同价值已经不复存在。正如老一代的两国关系监管人——他们指导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公理是强调全面接触能够给双方带来压倒性的共同利益——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几十年来的共同叙事就是“接触”，尽管这种接触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基于战略对冲，以防所有方面都出问题。但目前看来，作为两国关系统一叙事的战略接触已经正式而实际地结束了。

相反，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竞争时代，尽管就当前特定问题还存在某种层次的合作，但竞争已成为两国关系的新常态，合作反而成为例外。

因此，恐怕我们现在正走向中期战略对抗，因为双方都越来越多地使用零和博弈来不断争夺优势。两国关系再没掌舵人。战略转向已拉开帷幕。

而历史也告诉我们，随着战略转向的开始，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被抛入大海——自此两国关系将更容易受到浪潮的影响和事件的冲击。

几十年来的共同叙事就是“接触”，尽管这种接触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基于战略对冲，以防所有方面都出问题。但目前看来，作为两国关系统一叙事的战略接触已经正式而实际地结束了。

谁之过？

像这样的時候，人们往往会倾向于指认一方来为两国关系的现状承担责任。美国指出的诸多因素可能包括：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民族主义；《中国制造 2025》等重商主义战略；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朝着极其不自由的方向，高效地改写了一系列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中的国际规则；中国的全球网络攻击，包括最近美国政府员工信息失窃；中国攻击性军事能力的快速发展，与俄罗斯联邦军事合作的增加，以及在南海的填海造岛。

相比之下，中国会指出美国一系列违反自己制定的秩序规则的历史记录，从门罗主义对拉丁美洲政权的干预，到最近的涉足干预中东国家，包括单方面入侵伊拉克；美国向中国沿海进行侦察飞行，不断挑衅中国；特朗普总统单方面宣布针对中国的贸易战；更广泛地来看，美国破坏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以及逐步展开的技术战，其代表性事件是美国决定将华为从本国未来的 5G 网络中剔除。

尽管这样的指控可能会满足双方的一部分人，但遗憾的是它们并不会改变任何现状。与之相较，我的观点很简单：中美关系现阶段的恶化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现在拥有足够的经济、军事和技术筹码，对美国在全球和地区秩序中的长期统治地位构成了挑战。而两国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更加深了这种挑战。

此外，两国政治领导人，殊途同归地对彼此有了类似的结论。中国对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曾是学术界、智库和政策制定者热衷的争论和讨论话题，现在令人不安的讨论已经成为现实。

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清晰证明美方得出类似结论的证据。该报告指出：

中国和俄罗斯想要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中国正试图取代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地位，扩大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范围，并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制定地区秩序。俄罗斯则一贯寻求恢复其大国地位，并在其边界附近建立势力范围。当然，这两个国家的意向可能会改变。与此同时，美国也会做好准备，随时与两国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

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并支持其融入战后国际秩序，以使中国自由化。而与我们的希望相悖，中国却以牺牲他国的主权为代价来扩大势力范围。中国用难以匹敌的规模收集和利用数据，并传播其威权主义体制的特征，包括腐败和使用监控手段。中国正在建立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有能力且资金充足的军队；其核武库正在增长并且逐渐多样化。而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和经济扩张的部分原因，正是美国的创新经济，和美国的世界顶尖大学，对其的开放。

在今年8月的北戴河，中国领导人似乎也达成了类似的战略结论，即美国对中国的官方看法已经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

隆国强在8月底发表的一份权威社论中指出^②：

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美国一直在防范任何可能的赶超者。当年的苏联、日本都曾遭到美国多措并举的遏制。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上升，美国将其意识和情绪完全转向中国，重新定义了中美关系。……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因此，贸易战不仅是美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手段，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

中美关系确实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我相信，在这一问题上的关键的概念性见解，是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在其著作中，艾利森将“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应用于当前中美关系状态^③。艾利森在分析中指出，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引起美国这个守成大国足够的焦虑，使后者开始采取实质性、修正性的措施。艾利森对过去500年的外交历史进行选择调查后发现，在16起历史案例中，有12起出

^②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隆国强，“了解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人民日报，2018年8月29日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829/c1003-30257035.html>

^③ Graham Allison 的更多分析，请参阅他的著作《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现了类似情况并最终导致军事冲突。

即便如此，如果我们因此得出结论，将艾利森的观点理解为“修昔底德陷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那便是对艾利森作品的深刻误读。他正确地指出了战争的极大可能性，但是如果及时采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纠结措施，就可以防止这种冲突的发生。因此，在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结构性”与“能动性”是一个永恒争论的话题，事实是，现在，中美关系因为“结构”不同而日渐胶着，但我认为通过政治领导和外交干预这些“能动性”手段仍然可以避免灾难的发生。

因此，我们并不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僵尸”，麻木地走向国际灾难、冲突和战争的悬崖。如果这样，那就是约翰·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认为对于一系列不可改变的结构性冲突，只有通过大国之间的战争或屈辱的投降才可以解决问题，政治和外交起不到任何作用。

对此我强烈反对。中美两国领导人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选择武装冲突，但这将是双方领导人的主动选择，而非被天上的力量，或被不可改变的人性规律和社会关系，或被国家行为而胁迫就范。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中美关系不仅只有开战这个两难的选择，其他结构性的问题和主观能动性都与此有关。

近年来，随着我们从战略接触到战略竞争，我们观察到的两国关系的根本变化确实是结构性的。但是，两国关系处于现今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媒介”的角色，要通过两国的政治领导人的“能动性”，为两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寻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以避免更激烈的冲突。

我还不至于像康德式的理想主义者那样认为会凭空出现一套新的共同规范来取代各方都寻求自身优势的国家战略，以解决这个日益激烈的中美战略竞争，并且这个新规范会以某种方式来取代各方都寻求优势的国家战略。实际上，中美两方还是在竞争以寻求自身优势。这难以避免，也一直如此。

那么我在这里的论点很简单，在发展共同规范和激烈竞争之间，仍然还存在空间，即便对于当下的令人深感不安的中美关系而言。

中美两国领导人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选择武装冲突，但这将是双方领导人的主动选择，而非被天上的力量，或被不可改变的人性规律和社会关系，或被国家行为而胁迫就范。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中美关系不仅只有开战这个两难的选择，其他结构性的问题和主观能动性都与此有关。

确定战略竞争的规则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在中长期保持和平的大前提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前景是什么？还是说，我们已经处于滑坡效应当中，战略竞争的两方将很快成为敌人，并引领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冷战，甚至在某天会爆发热战？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讨论。

是否还有可能，比如说形成一个共同的战略叙事，能够将激烈竞争和特定领域的持续战略合作有效地结合起来，并且缩小两国间日益扩大的意识形态鸿沟？或者说，我们现在是否处于一个勇敢新世界，新的游戏规则尚未确定，只能通过国家战略间的相互摩擦和碰撞，在混乱中最终出现某种新的权力妥协；抑或没有妥协，结果无从知晓，只能听天由命？

确定战略竞争规则是我们这些关心两国关系的未来，并且将双方视为朋友的人目前都在思考和参与解决的问题。它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难的问题，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这是因为如今两国间的差距仍然巨大，任何试图充当两国间桥梁的人都可能被指责在是试图偏袒一方。

历史（至少是工程师们）告诉我们，桥梁如果受到太大的压力就会屈曲然后坍塌，至少工程当中的桥梁是如此。试图在中美两国架起桥梁，无论多么谨慎，也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当然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看台上观战，为交战双方当中的某一方加油助威。这样当然更安全，也绝对会更舒服。但是，这无助于寻找解决之道。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确定战略竞争规则仍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比贸易战更深入——技术是个新“战场”

目前对这个问题，很多评论还都是集中针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正如之前所说，现在贸易战是中美关系多年来不断发展的结构分歧的体现。我们在双边投资中也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大量涌入到现在的涓涓细流，中国流入美国的投资已经大幅放缓。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场新战略竞争所展开的重要新战场是在高科技、信息技术和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领域。下面是一些正在拉开的战线。

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于3月发布了一份关于被其称之为“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工具箱”^④的报告。根据该委员会的说法，中国目前的任务是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企业，不

^④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Katherine Koleski 和 Nargiz Salidjanova，“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工具箱入门”美中经济

仅要在国内代替国外技术和产品，还要在国际上取代它们。这在 2015 年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中得到了最明确的体现，该战略确定了中国在每一个工业和技术部门计划占据主导地位的具体目标。

根据该委员会的说法，中国正在通过这十项具体政策战略来达到目的：

- 1) 本地化目标（例如，截止到 2025 年中国供应商可以占到国内工业机器人市场 70% 的份额）；
- 2) 国家资金投入工业发展（例如，太阳能企业的大型补贴，尽管据报道现在已经减少了）；
- 3) 专项政府研发资金，截至 2015 年，总计已达到美国研发资金总支出的 75%；
- 4) 政府采购（例如，要求在中央政府采购中选择国产汽车品牌）；
- 5) “中国定义”的新技术标准（例如，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的信用卡技术加密标准，这些标准与现有国际标准皆不相容，仅限于如银联这样的国有信用卡使用，不通用于 Visa 或万事达卡）；
- 6) 监管门槛（例如，要求成立合资企业作为企业进入中国的前提条件）；
- 7) 外国投资限制和进口指导（例如，通过引导外国投资目录及其鼓励进口技术产品目录，将不同的产业部门定为“鼓励、允许或限制”外国投资）；
- 8) 由国家驱动的外来人才引进（例如，国家资助的项目，如“千人计划”和“111 计划”等，后者专门针对来自世界排名前 100 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 5000 名外国科学家，其激励方案大大超过了正常学术市场所能拥有的）；
- 9) 国家指使的外国技术收购计划，由此，中国政府资助中国企业收购外国科技公司——例如在 2015—16 年中国收购了约 21 家美国半导体公司；
- 10) 工业间谍。

据美国商会称，《中国制造 2025》是一项“十年全面蓝图”，旨在将中国转变为在 10 个战略性行业领域的先进制造业领导者，其中包括下一代信息技术、航空、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和农业机械。美国商会和美国政府对“中国制造 2025”的主要不满在于，它既由国家主导，也受国家资助，从而造成了对依靠自身实力寻求公平竞争的国际公司不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事实上，美国商会在 2017 年的评估表明，“中国政府提供资金仅在《中国制造 2025》当中就约有 6320 亿美元”。

《中国制造 2025》不是中国唯一的计划，另有旨在使中国从 20 年前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制造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一跃成为全球高科技强国的战略性产业计划。

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8 年 3 月 28 日，<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China%27s%20Technonationalism.pdf>

还有许多其他政策工具，包括：

- 中国第 13 个五年计划（2016–2020）
- 中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06–2020）
- 中国 2010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倡议；
- 中国 2017 年下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计划，旨在到 2030 年使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针对智能联网车辆、智能服务车辆、智能无人机、计算机辅助医疗成像、视频图像识别、人工语言智能和计算机翻译等特定技术。

那么，美国对这些政策举措的不满自始至终在于中国试图通过利用国家大量分配资源来实现中国的全球技术优势，这对竞争性全球市场的正常运作会起到破坏作用。

美国进一步表达的担忧是，中国在民用经济中由国家驱动的高技术发展和综合军事应用有着明显的相互关系，例如机器人战争技术的迅速发展。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认为推行大量的国家驱动的战略符合其国家利益，因为中国认为美国会出于国家利益阻止中国通过开放和竞争的市场获得这些能力。

例如，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计划特别指出，“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无法买到真正影响到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命脉的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因此，正如计划本身所提出的，为了应对这个致命的弱点，中国必须通过改进“国外技术的吸收及再创新”来实现自主的独立创新。

习近平主席最近就中国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发表的讲话中也传达了同样的情绪。讲话指出，如果没有国家创新、改造和自力更生，中国的长期经济和国家安全将受到根本威胁。如果希望了解习近平主席在这些领域所做出的国家政策承诺的广度和深度，就应该读一下他在 2018 年 4 月 30 日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对中美技术战争的新兴战场做出了发人深省的思考。

现实是，那些寻求就中美关系未来的整体方面进行研究的人将不得不应对新兴的高技术冷战。如何应付中美之间这场在高技术层面展开的新战略竞争将是未来的根本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显著特征。因此，政策制定者也必须全面掌握这个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

如何应付中美之间这场在高技术层面展开的新战略竞争将是未来的根本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显著特征。因此，政策制定者也必须全面掌握这个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

中美关系风雨飘摇

综上所述,今天在这里,旧金山湾区,硅谷所在地,大家会发现自己正处于这场中美激烈竞赛的前线,这一场为获取未来在高技术产业霸主地位的竞赛。如果大家认为该行业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已经变得越来越激烈,那么我的预测是:好戏还在后头。

竞争只会变得更加激烈。这场竞赛已经开始,起跑的枪声已经打响,竞争只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回到这次演讲的主题:华盛顿和北京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他们是否允许这种程度的为获取新科技新制高点的战略竞争从根本上破坏两国整体关系的稳定。

这又让我们回到了一个战略问题,即什么样的框架可以促进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并能够同时驾驭在特定领域的激烈竞争和相互合作。现在必须在这项工作中注入大量的创造性努力——除非我们决定袖手旁观,让两国关系有可能急速恶化甚至完全失控。正如一开始所说,当我们回顾2018年时,我相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已开始明显超过战略合作的转折性一年。

布朗州长在加利福尼亚州召开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正好也在本周,或许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有望在未来继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尽管大量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因素在全面地冲击两国关系。我们希望,在目前看来逐渐消极发展的两国关系中,气候方面的合作能够继往开来。

华盛顿和北京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他们是否允许这种程度的为获取新科技新制高点的战略竞争,从根本上破坏两国整体关系的稳定。

我把这次演讲的主题命名为“中美关系风雨飘摇”。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的加剧,我们开始看到气候变化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让我们希望,为了所有人的未来,这个两国关系中最后剩下的压舱石能够得以留存。这是地球需要我们做的。

我心中的乐观主义精神,让我相信,尽管当前美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科学、政策和行动持有敌意,但由于美国联邦政府之外的其他气候变化行动者的重要努力,中美两国在这气候变化上的合作或许可以幸免于中美大局之难,并继续繁荣发展。在中国,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也正经历着巨变,中央政府支持,社会讨论活跃。我们需要中美在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因为全球气候风险巨大,各种极端天气事件越加频发,海洋温度上升超出预期,最新的相关科学报告也开始预测陆地温度变化将来得更早,温度会升得更高。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之间持续的气候合作很有可能成为双边关系中最后的压舱石。

然而,在战略竞争的新时代,纵然中美之间可以形成新的规则,也将难免面临重重挑战。

4. 中美：可免一战

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

2018年10月10日



PACIFIC OCEAN (Dec. 14, 2007) The Ticonderoga-class guided-missile cruiser USS Chancellorsville (CG 62), the Arleigh Burke-class guided-missile destroyer USS Decatur (DDG 73) and the other ships of Destroyer Squadron (DESRON) 7 steam through the Pacific Ocean during a submarine familiarization with the Nimitz-class nuclear-powered aircraft carrier USS Ronald Reagan (CVN 76). U.S. Navy photo by Mass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2nd Class Christopher D. Blachly (Released).

六个月前，我有幸在西点军校为学员演讲。六个月后，我很荣幸能来到阿纳波利斯，参加这场由美国海军机构与美国海军学院联合举办的会议。此次我讲话的主题与上次类似——如何解读中国的崛起，中国对于未来的规划，以及这些对于美国及其朋友和盟友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必须提到的一个经历，是我在西点军校和大家讨论应如何面对未来的敌对势力时，看到学校里挂着写有“打败海军”的条幅，而不是“打败中国”，很有意思。但他们告诉我，海军才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敌人。我在西点山脚下住的很精致的房子也被冠名为“打败海军”。而我今天在这里也见到大家心怀鼓舞，要“打败陆军”。挺好，大家都站好了队。12月8号的陆海大战，希望狭路相逢勇者胜。想必海军憋着气要洗刷此前失败的耻辱。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位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几年前，我到过位于罗德岛的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做演讲。1845年，时任海军部长的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建立了贵校，选中安纳波利斯这个安静的小城，目的是让学生们远离“大都市与生俱来的诱惑和干扰”。

我不知道当时美国海军的新兵怎么看待，但如果换做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话，可能就要发生兵变。事实上，当我打算把东部的海军基地从悉尼迁到澳大利亚北部的汤斯维尔时就遭到了反对。悉尼无疑充满了诱惑。最终转移军事基地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1918年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那一天，美国与澳大利亚在西部战线的哈梅尔战役中并肩作战，也是一战中美军作为盟军对德国发动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从那算起，澳大利亚与美国间的同盟已走过了一个世纪。

就在现在的切萨皮克湾口，1907年西奥多·罗斯福的大白舰队从这里的汉普顿锚地出发，开始环球航行，向世界展示美国海军的威力。当年美国大力发展海军，当今的中国也一样。这支舰队在1908年到访过悉尼和墨尔本。我担任总理时，办公室的墙上就挂着康涅狄格号战列舰（USS Connecticut）那天停泊在悉尼港的照片。在美国大白舰队的鼓舞之下，澳大利亚在1913年成立了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引起了当时伦敦的海军部的不安。时任工党领袖的安德鲁·费希尔坚决维护这支海军的独立性，不让其沦为英国远东舰队的附属品。一个世纪以后，我从澳大利亚派遣了一支舰队来到美国东岸，庆祝大白舰队一个世纪前访问澳大利亚海岸。

我们两国的海军在二战期间的对日作战中并肩战斗，期间损失了大量的战舰和成千上万的水兵。他们为我们共同追求的自由价值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在那之后，两国海军在朝鲜、越南及波斯湾等战区也曾进行联合作战。

担任总理时，通过《2009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我很高兴自己帮助澳大利亚海军进行了和平年代最大规模的扩张——购买两艘直升机航母，增强未来必要时承载固定翼飞机的能力，将水面舰艇部队扩大1/3，将潜艇舰队扩大一倍。船只都已投入生产，部分已经建成。海军扩建背后的战略目的是应对中美两国间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平衡的变化。十年前，我主持的内阁国家安全委员在多次会议后制定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总结道：

“不出意外，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地区和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战略影响力将超出东亚地区……”

“该地区乃至全球的主要关系将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美关系的管理对于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至关重要……”

“中国将以相当大的优势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将越来越体现在军事投送能力的发展上。但如果中国不对其军事发展进行详细解释，或提前与周边国家充分沟通来建立信任，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范围和结构，有可能造成邻国的担忧……”

“如果不这样做，地区国家很可能会对其部队发展计划的长期战略目标产生疑问，特别是在其军事现代化似乎可能超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所需要的范围的情况下。”

在此之后几年才有证据表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我们在正式发表之前向日本政府大致说明了文件内容，当时他们惊讶于我们如此直接。当我们事先拿给中国政府看时，他们也大吃一惊（根据当时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要求我们删除其中冒犯性的内容。我们拒绝了。

多年来，应对东亚安全环境变化的复杂性给美国的盟友带来了自身挑战，而大多数挑战是华盛顿制定政策时是看不到的。在此过程中，澳大利亚寻求与北京保持平衡关系：在与中国追求对双方有利的经济关系的同时，深切铭记我们在安全利益和根本价值方面的分歧。我任总理时，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包括对西藏、新疆和澳大利亚的华裔公民）曾多次激起了中国的愤怒；在贸易方面，比如我们拒绝华为参与澳大利亚的电信和宽带网络，也拒绝某些战略性的国外投资提议：比如拒绝国企中国铝业收购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集团。与此同时，我们扩大了与北京的安全对话，中澳贸易额增长，我们批准了中国经济非敏感领域的大量投资。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超过了除美国之外所有国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们通过20国集团与北京密切合作，帮助稳定金融市场，恢复全球经济增长。

我今天开篇的这番话，是想说明多年来我们中不少人当政时，一直寻求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的良方，

而有些新闻界、学届和智库界人士则躺在舒服的椅子上口诛笔伐，乐此不疲。在一线与中国打交道不像其他，我们必须分清楚哪些是重要的战略问题，哪些是政治上的昙花一现。

在以上背景下，充分考虑到此前提出的议题，我今天想要讨论以下几点：

第一，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如何看待未来？

第二，习近平的战略目前进展如何？

第三，在美国深刻战略变革的框架内，我希望提出几个问题，供美国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在未来施行新战略时参考。

第四，我会就美国等民主国家正在开展的“中国大辩论”的语气、主旨和方式等方面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中国的崛起

1918年11月一战停战的100周年纪念日再有一个月就到了。这场战争由20世纪强国发动，被称为“终结所有战争之战”，但众所周知，它没能结束所有战争。自一战以来，地缘政治的世界版图已被改写过三次。

我相信，当今后回望2018年的时候，历史会把这一年当作21世纪中美两大强国关系变化的关键点，尽管没人能自信地预见地缘政治的长期轨迹。

要明确的一点是，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并非始于2018年，而是40年前就开始了：一党制的中国，以追求富强的战略，持续崛起。然而，尽管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治下，中国内部“综合国力”稳步增强，但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战略意图才变得清晰起来。这也反映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的行动节奏加快。如果战略分析的支柱是能力、意图和行动，那么从这三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不再是满足现状的大国。

但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战略意图才变得清晰起来。这也反映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军事、外交和经济政策方面的行动节奏加快。

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中国国家财富和力量的增加在习近平的国际视野和国家优先事项中所处的位置。我三月份在西点军校演讲时说习近平的主张可以理解为国家利益的七个同心圆，这里做一点修正：

- 中国以共产党为核心，确保共产党长期执政，以及习近平的党内核心地位；
- 国家统一与内部团结；
- 保持经济平稳发展，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打破“中等收入陷阱”，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城市精英对环境保护的诉求；
- 保持周边的 14 个邻国善意且最好是弱势姿态；
- 在中国周边海域部署海空力量，政治上瓦解美国在亚洲的联盟，最终从军事上将美国赶出临近海域；
- 针对广大陆地周边地区，利用中国自身经济实力，让欧亚大陆乃至中东地区和非洲适应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和安全利益；
- 改革部分而绝不是全部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以使之更为符合中国的利益，更好地体现中国国内的价值观而非战后世界范围内的价值共识。

当然，战略目标路线图并不意味着目标的完全实现。中国的领导人面临复杂的内外部挑战，如果换做我们的话恐怕头发早就愁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能成功。中国的成功有充分的理由。我就每一点展开讲一讲。

在国内政治当中，尽管习近平通过铁腕的反腐清党，变革军队结构和安全信息机构，维护了自己在党内的核心地位，但党内必定有人对于个人崇拜、取消主席任期限制以及中国涉美战略扩张心存怨念和不满。目前我们不能确定谁是下一任领导者，哪怕是习近平的继承人。因此设想习近平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条件情况下再执政至少十年是较为明智的。

在民族团结方面，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严打”已经引起了西方和穆斯林世界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台湾问题则更难解决，因为台湾地区民主制度的韧性，与日俱增的与大陆不同的家园认同，以及极少关心 1949 年之前历史的代际变化。西藏的问题也仍然棘手。

经济上，由于市场主导的经济改革的放缓以及“从顶层”开始的去杠杆化运动，来减少二线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负债，还有因为与美国贸易战争对信心的影响，都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中国央行迅速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减缓应对中国巨额债务（估计占 GDP 的 266%）的行动。此外，中国公众已经开始要求政府对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采取迅速和彻底的行动。简而言之，中国经济可能慢慢变成一种负担，而不是在过去 40 年增强政党合法性方面的实力。

然而，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在中国政府看来大体上是稳定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由于对美存在一

致的战略利益而变得更紧密。中国主动将与日本和印度之间存在的问题降温。而日本和印度出于自身利益，以及对美国发展方向的不确定，也倾向于在短期内和中国保持平和的外交关系。越南在选举换届之后不再像之前那样强势，而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问题上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团结。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虽然有些难以预测，但菲律宾与中国的关系比起以前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十几年前，昂山素季没能如中方所愿成为缅甸元首，但现在中国军方与缅甸军方的关系得到修复，使得两国关系也趋缓和。而现在美国与朝鲜的破冰，以及朝鲜与韩国的交好，也为自 2011 年来被冷冻的中朝关系带来恢复的热度。

周边海域方面，美国正在以更加强势的方式在南海挑战中国的海上领土主张。但总体来说，东南亚正在向中国靠近，而非美国。不久前，柬埔寨是中国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当中唯一可信赖的伙伴，但情况已经变了。东盟现在采取战略对冲模式，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比美国、欧洲乃至东盟国家间要强很多，而且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投资力度也很大。马哈蒂尔当选马来西亚总理后，停止了中国与马来西亚间几项主要基础设施建设协议，给中国领导人带来了新的难题。但基于中国的经验，这很可能只是战术上的挫折，而不是战略上的失败。中国在这场大博弈寻求获胜的关键核心因素是其对东南亚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就是资本流动，这是美国或欧洲在这片土地上达不到的。而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更进一步确立中国在区域的优势地位。美国从此将被亚洲经济贸易体孤立，也意味着中国有了更大胜算。

中国陆地周边地区并非风平浪静。一边有国家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另一边也有国家想参与进来从中受惠。当“一带一路”倡议遇到债务、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国家主权等阻力的时候，其中很多阻力在美国看来足以令当事国退出该倡议，然而中国却总能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各个击破，推动问题产生实质性成果。这些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赞比亚等国家都发生了。目前已有 70 个国家参与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但美国没能拿出一个与之旗鼓相当的项目。“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阻碍并非是找不到国家来配合参与，而是中国投资了太多经济效益不良项目，造成中国经济资源的长期流失。

“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阻碍并非找不到国家来配合参与，而是中国投资了太多经济效益不良项目，造成中国经济资源的长期流失。

最后，中国对自身在维护国际秩序和参与国际组织行动的方面应当是比较满意的。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中国来说是天降的好事，因为这个组织经常通过国家报告对中国很多决策的合理性提

出质疑，是最让中国头疼的多边机构之一。尽管中国并不想要真正地践行全球贸易自由，完全开放市场，但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攻击也增强了中国在该组织中的地位。美国对联合国的攻击给中国加了分，更让人觉得中国在联合国多边体系中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尤其在行动上，中国也确实增加了援助款，派遣了更多维和部队，把更多中国人派到联合国工作。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最大的问题是，在一些问题的投票上与俄罗斯的关系过于亲密，在一些对非西方国家的敏感的决议上，如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已经疏远了欧盟和海湾国家。尽管如此，中国通过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全球外交网络，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开展全球经济外交，这意味着中国能够在多个联合国论坛上获得强大的政治支持。这种对中国战术利益的支持，最终能否转化为对正式改写现行国际体系规则和做法的根本结构性支持，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争议。中国之前的外交更具有渐进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而不是必然宣布范式“改革”。随着中国民族自信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加，这个问题会慢慢有答案。

因此，在中国政府看来，中国、地区和世界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毫无疑问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也有实现这种眼光的宏观布局。可以说，如果中美两方政府没有大的政策变化，中国是有一些胜算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反对中国的共产党政体有一天会因为内部矛盾而崩塌的论调。习家军不想走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怕行不通，所以他会寻求一条新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化的道路。如今中国有一个成功的集权资本主义的政体，并正将科技用于政治和社会管制中，以及共产党百年意识形态上，是有可能胜出的。而美国想要扳倒中国，仅仅在哈德逊研究所作一篇演讲是远远不够的。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毫无疑问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也有实现这种眼光的宏观布局。可以说，如果中美两方政府没有大的政策变化，中国是有一些胜算的。

战略接触结束，战略竞争时代已经到来

在过去四十年中，除了习近平的执政宣言和强势管控，中国对中美关系的经营战略大体是平稳的。反而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1月的《美国国防战略》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变化。两国间的贸易战在2018年6月打响，而且之后愈演愈烈，也体现了这一点。美国国防部于2018年9月公开的关于未来国防制造业、工业、和技术需

求当中也有明确。此外，彭斯副总统 2018 年 10 月在哈德森研究所的谈话更是直说了^⑤。

如果提炼出这些改变美国所宣称的意图的各种陈述的精髓，可有以下几点：

首先，1978 年后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触”未能在中国国内市场，为美国企业的出口和投资，创造足够的经济开放；中国不是在全球规则秩序中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是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替代秩序；而且中国在国内政治上没有变得更加民主，反倒决定在列宁主义方向“加倍下注”；

第二，除此之外，中国现在打算让美国离开东亚和西太平洋，并随时间推移超越美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世界经济大国；

第三，中国希望在如下方面形成主导，在国内和国际上超越美国：通过国家主导的产业、出口和外商投资战略掏空美国国内制造业和技术；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伙伴、朋友和盟友形成一系列经济激励；快速扩张在东海、南海、印度洋沿岸国家和红海吉布提的军事（和海军）势力；

第四，这些因素与俄罗斯一起构成了对美国安全和未来繁荣的核心战略挑战，因此需要美国战略路线的紧急改变，从与中国的“战略接触”进入“战略竞争”的新时期；

第五，美国对中国国家能力、意图和行动的新分析现在将转化为一种新的多维度、可操作的战略，旨在打压中国外交、军事、经济、援助和意识形态在国外取得的进展。

如果美国对华战略的这一新方向体现在未来的美国政策落实中，那么 2018 年确实将成为中美关系根本分裂时期。

关于美国今后政策的一些想法

在此演讲中，没有人要求我评价美国对华新政的英明与否。我也不打算这么做，因为这是美国内政，而我不是美国公民。因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在未来数月及数年中会深受美国和中国所作决定的影响，所以我想提出一些问题，供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华具体政策的过程中掂量考虑。你们全世界的朋友和盟友也是要考虑这些问题的。

首先，美国的对华策略最终希望起到什么效果？如果中国没能够同意顺从副总统演讲中提到的那些要求，甚至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将怎么做？英文中的“战略”（Strategy）一词起源于希腊语，用来

^⑤ 请参阅 2018 年 10 月 4 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的讲话，<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形容将军的指挥才干，定义是“为某个长期目标而设定的执行方案”。那么如果美国政策不能带来理想的结果，而是恰好相反，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加推崇重商主义、民族主义和好战的国家，那当如何？政策会导致两种广泛意义上的结果：中国让步，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或者中国继续推行和强化现有政策。这其中自然也还有很多可以斡旋的余地。想必美国已经对可能出现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突发情况做过准备，寻求在紧张的中美关系和利益斗争中获胜？你们的盟友也需要仔细琢磨这个问题。

第二，如果我们正处于战略竞争时期，新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如何与北京交涉，在这个“游戏规则”上达成一致？或者，除了那些历经时间考验的不变的准则外，已经不再有规则可言？事实上，经过40年的双边关系建设，逐渐影响并支配着双边关系的文化、习惯、规范和部分准则已经慢慢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代代相传，融入政治、外交、军事和金融领域从业者的骨髓中。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什么规则能够让我们避免海上冲突（例如最近美国凯特号驱逐舰〔USS Decatur〕与中方的对峙事件），以及空中冲突、网络攻击、核扩散、第三世界国家间的战略竞争、中国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和抛售、汇率的走向，和其他的主要领域的冲突？还是说美国已经认为中方已经根本性地违反了之前的双边准则，再没什么可失去的，所以将毫不顾忌地抛弃双边关系的规则？美国政府需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第三，中美之间是否依然有存在共同战略叙事的可能，使两国有可能为双边关系的未来设定概念参数？作为一种概念，战略接触暗含一系列相互义务。美国现在认为，中国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这些义务。但是，在缺少新规则或者共同的概念框架管控双边关系的情况下，该如何及时防止（两国）从战略竞争滑向脱钩、遏制、对抗、冲突甚至战争？如果历史可以借鉴，这样的转化之快，可能超乎任何后现代政治家的预期。1914年夏天一件小事引发的局势升级令人警醒，当然核时代的战略算计也在修正传统历史经验。

第四，如果美国的战略制定者们已经考虑到可能与中国从战略竞争关系走到全面遏制、经济孤立，甚至再引发一场冷战，那么他们应该对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那封有名的“长电报”和他第二年发表的题为《苏联行为根源》的“X”文章深入分析一下。凯南说，如果苏联能够被合理遏制，那么内部压力最终可能迫使其瓦解。一个很自然的假设是，如果对中国施以相似的遏制，其内部矛盾也会让中国最终瓦解。但这个假设可能不成立。中国经济的韧性、从美国敌对国家那里满足能源需求的能力、政府手上用来进行政治和社会管控的新技术都意味着中国不会像苏联一样。2018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超过苏联成为历史上最长存的共产主义政权。纵然其确实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弱点，

但是政权解体一说，多数人不会认同。

第五，美国是否认为中国特有的“威权资本主义”政体会对民主资本主义观念造成威胁？还是说将这种政体看作保守、自由或社会民主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苏联在全世界用与其相似的意识形态性建立了多个“附属国政权”——有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还是说中国仅仅希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援助扶植起一批支持势力，并不想散播政治理念，也不想进行武装干预？

第六，我们看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以及贷款和援助对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项目做出金融承诺与支持，美国准备提供类似的金融承诺与支持进行战略反制吗？上周美国对世行增资的支持是一个受欢迎的进展，但增资额度与“一带一路”的规模相形见绌。而如果没有这次注资，有天世界银行的全球资产负债表在中国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放贷能力面前都会黯然失色。

第七，除了优惠贷款和无偿援助，更宏观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将如何与中国在亚洲和欧洲的贸易及投资规模相竞争？对于亚欧许多国家来说，中国是比美国更大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取消与亚洲签署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以及与欧洲签署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对美国在这些区域的地位将产生什么影响？美国将如何阻止这些国家在中国经济的向心力作用下进入中国的经济乃至政治轨道？

第八，基于此，美国到底有多自信，认为自己的盟友和伙伴会全然拥抱它的对华竞争新战略？美国持续公开攻击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友以及整个北约，加上对日本和印度征收关税之后，还会笃信这些国家会支持其反华新战略？或者说，这些国家和地区会继续观察中美力量对比和战略互动，并在之间摇摆？此外，东南亚现在是中美战略影响力新的“大博弈”战场。还有中东，中国是其油气的更大市场，已经超过了美国。

第九，是什么让美国的新理念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吸引力，以支持其对华新战略？彭斯的演讲清楚且有意识地传达出美国的利益和价值，但这番演讲没有呼应国际社会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历史上，国际社会与美国共享这些相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并体现在美国战后主导的秩序中。但现在，国际社会目睹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名，抛弃了这种秩序的诸多关键要素（人权、多边贸易体制、气候变暖、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多边援助机构等）。

国际社会目睹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名，抛弃了这种秩序的诸多关键要素（人权、多边贸易体制、气候变暖、国际刑事法庭、联合国多边援助机构等）。

最后，还有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出现的重大裂痕，对全球经济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影响。考虑到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若因用激进方式实现两国经济脱钩，导致双边贸易锐减或者垮塌，这会对美国 2019 年经济增长以及全球增长有何影响，是否会触发全球经济衰退？同样，鉴于本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刚公布的全球气候变化报告指出，因为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的行动不足而让全球面临潜在灾难，如果中国只能凭借自身力量减排，后果将是什么？

美国的其他决策者寻求细化特朗普时代对华战略竞争时，上述是他们应该考虑的 10 个重大问题。我们如今正在未知的水域里航行，我们不想看到意外后果发生，尤其是危机和冲突。100 多年后，1914 年的警钟依旧在我们耳边回响。

今天，对美经济战或者武力对抗都不符合中国利益。中国知道自己依旧没那么强大。但在退无可退之时，事情会发生变化。民族主义可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常常无视任何经典战略逻辑（无论此逻辑是来自中国的《武经七书》，还是马汉或冯·克劳塞维茨）。

我还要说清楚，我今天提出的问题并不意味着美国应对中美关系的现状负责。事实上，我一个月前在硅谷演讲中谈到中美关系变化的本质主要是结构性的：首先，从全球和区域层面来看，中国已经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体量很大，所以重写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一种结构性必然。第二，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开始考虑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军事力量之间完全不同的观念、传统和未来蓝图。因此，追究责任于事无补。

让我明确一点，中国的全球和地区政策在过去十年中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上所述，中国早已不再停滞不前，无论是在南中国海、东南亚、欧亚大陆、非洲、拉丁美洲还是目前的国际秩序结构。中国的确一直在变化。而美国直到最近才变化。今天的核心问题是理性地确定中国的发展轨迹，美国对其中国政策的新目标是什么，以及美国未来战略应对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因此，政治指责，同样无济于事。

战争可避免吗？

这次会议的大多数与会者都是认真对待中美关系的，在努力应对我们面临的思想上和政策上的复杂性。这绝非易事。但达成共识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最大的清晰度。

我很清楚，在目前紧绷的政治气氛里，中美学者面临的环境比以往更困难。某种观点的支持者会被冠以各种标签，比如“中国绥靖者”，甚至是“熊猫拥抱者”。而另一种相异观点的支持者则被称

为“战争贩子”。我们必须警惕新的麦卡锡主义。最近，我发现，当我们想要解释中国崛起的复杂性时，就会被斥为搞反美活动（或者反澳活动）。简单的答案（或者说站队）似乎更受待见。但正如我反复提醒，客观而言“中国崛起”绝非一个简单问题；任何简单的回答都是智力上的懒惰和道德上的不负责。

令人担心的是，目前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就中国问题进行公开、深入辩论的空间在缩小。越来越多人会提出“你到底站在哪一边？”这个以前从未宣之于口的问题。哗众取宠的做法显然简单廉价。真正有价值的是，思考出什么才是长久、可靠的公共政策，能够实现共同商定的目标，长远保持自由、繁荣和可持续，同时不会产生预期之外的后果。尤其是危机、冲突或战争。

我从未假装是中美之间的桥梁。如此做法可谓有勇无谋。我所追求的至多是，就我所知，向一方解释另一方的政治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并在此中试图找出共同利益和价值交集。最终如何处理，是中美自己的选择——中国和美国都足够成熟，经验丰富，也都遭受过战争之苦，能够最终在他们之间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也想说，任何试图承担桥梁重任之人，亦会在面临来自桥两头的不能承受之重时，以及支撑桥的主要基石开始移动时，崩塌。


所以，在当下美国展开有关中国的大辩论的背景下，我总是禁不住想到亨利·基辛格博士的睿智忠告。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成立之时，曾向他请教我们的责任应是什么。基辛格一如既往地娓娓道来：我们需要从三个角度来审视世界：第一，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为什么会发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忽略了什么？

如果要问在眼下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我选择站在哪一边，我的立场是：中美之间，战争可以避免。我站在“难道除了投降或对抗，就没有帮助我们避免踏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三条路？”这一边。

为了这一目标，在目前的关键阶段，政策圈和学界负有特别责任，去尽可能多地讲清楚我们所看到的，而不是火上浇油。要讲清楚，我们就有必要换位思考，通过对方的视角观察现实，哪怕我们可能不赞同。

眼下，沙文主义更容易流行，而扎实的战略和良好的政策却弥足珍贵。我期待有更多善者智者，贡献智慧探索方法，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最典型的当代安全困境。

我们必须警惕新的麦卡锡主义。最近，我发现，当我们想要解释中国崛起的复杂性时，就会被斥为搞反美活动（或者反澳活动）。简单的答案（或者说站队）似乎更受待见。但正如我反复提醒，客观而言“中国崛起”绝非一个简单问题；任何简单的回答都是智力上的懒惰和道德上的不负责。

A photograph of a policeman in a tan uniform and cap walking past a row of flags representing various ASEAN member states. The flags are flying on tall poles against a clear blue sky. The policeman is in the foreground, looking down and to the right. The flags include the national flags of Thailand, Indonesia, Philippines, Malaysia, and others.

5. 美国、中国和东南亚：东盟能否找到新的战略平衡？

在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讲

2018年11月8日

A policeman walks past a row of flags representing various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grouping at the My Dinh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Hoang Dinh Nam. AFP. Getty Images. 2010.

感谢迪诺·帕蒂·贾拉尔（DinoPattiDjalal）大使和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协会的邀请，让我今天在雅加达发表这一讲话。当今世界，美国和中国分别代表了相互竞争的安全和经济力量，东南亚夹在这两股力量之间，日益受到拉扯，在此背景下，东盟如何把握自身的未来，能否在应对过程中使该地区达到新的战略平衡呢？这是我今天应邀谈论的内容。

美国对中国战略看法的变化

中美关系现已进入新阶段。用美国人的话说，过去40年“战略接触”结束；新的“战略竞争”时期开始。战略竞争的确切定义是一种行动上而非空谈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尚未完全出现。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系统性转变，那是十分不明智的。

尽管美国中期选举已经产生了结果，但令中国感到不安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得到了包括民主党在内的两党支持。事实上，我在美国国会的朋友（共和党 and 民主党都有）最近都提醒我，对中国的战略可能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达成共识的唯一事情。

中国现在被美国视为贸易威胁，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关税措施就是为了解决特朗普总统所说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向中国的问题。不仅如此，中国也被美国视为经济威胁。中国在2015年宣布中国制造2025战略，希望在2030年主导全球高技术市场，美国认为这样的意图威胁自身。

此外，知识产权窃取，强制技术转让，中国贸易和投资行为的“不公平”（用美国人的话来说），都让美国持续关切。当然，除了经济之外，中国基本上被美国外交、安全和情报政策机构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系统性安全威胁，不仅对美国国内，也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利益造成威胁，而且还威胁到了更广泛的印度太平洋地区。

美国在国家军事力量方面对中国还有更深层次的顾虑。中国的国家高技术战略快速发展，在技术层面迅速地拉近了目前中美军事实力之间的差距。美方关于中国军事实力和军事活动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看法建立在中方发起的对美网络战的基础上，也因为中国人工智能水平的快速发展以及中方将技术

但令中国感到不安的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得到了包括民主党在内的两党支持。事实上，我在美国国会的朋友（共和党 and 民主党都有）最近都提醒我，对中国的战略可能是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达成共识的唯一事情。

应用在军事领域中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战争。

这些担忧已经超越了美国对中国的传统顾虑，如中国的海军扩张和军事现代化计划、中国南海填海造岛和军事化工作以及印度洋上遍布的中国海军基地（一直延伸到红海的吉布提）。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军事和海军演习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也加剧了美国国家安全界的担忧。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也因为中俄政治外交密切合作的程度而深感震撼，从乌克兰到中东再到朝鲜。

在美国，不仅政治和官僚机构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新战略威胁。美国的企业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因为这些企业在向中国出口、投资中国业务或将利润带出中国的过程中受挫、遇阻，所以感到不满。与此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智囊团、学者和非政府组织也在加入，因为这些团体认为与中国几十年来的接触没能让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日益自由化。

更为根本的是，美国已经得出结论，虽然美国欢迎中国进入开放经济的国际社会，但是 2001 年末 2002 年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机会，已被中国利用和滥用，将国家权力最大化，而不是让自身的经济模式与 WTO 规范相靠拢。市场自由化并没有让中国成为更开放的经济体或更自由的政治体系，中国国内改革步伐已经明显放缓且方向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更加坚定地决心走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维护党的领导。

由于这些原因，在美国的政治心理深处，觉得中国“背叛”了他们，认为中国不是在适应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与国际社会，而是在“欺骗”美国，追求一个传统的，甚至是复古的中国治国之道。此外，美国还有一种潜在的觉醒意识——从经济和军事角度来看，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开始与美国相媲美，这对于美国来说是近 100 多年来都未曾遇到过的问题。

中国的反应

当然，中国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主张的。中国认为其经济发展现阶段的主要关注点是在国内。中国解释说，过去五年来，中国一直专注于党内的反贪腐运动。对于更加坚定走马列主义道路一事，中国表示从未声称自己不是马列主义国家，也从未假装会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

美国在国家军事力量方面对中国还有更深层次的顾虑。中国的国家高科技战略快速发展，在技术层面迅速地拉近了目前中美军事实力之间的差距。

中国的宪法也是这样陈述的。因此关于中国国家制度的揣测都只是美国的假想。

中国还坚持认为自身专注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中国关注西藏、新疆及其对台政策的领土问题，在东海和南海事务上强调历史上的主张。中国也很坚定，这些是中国内政，不会允许他人插手。

在经济方面，中国指出 40 年的“改革开放”让 8 亿中国人脱贫，这在很多层面来看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还表示，本国的经济体系框架（我们在西方称之为专制资本主义体系）是中国自己的决定，不需他人的干预。

事实上，中国表示自己在专制政治文化与以市场为基础的重大经济改革之间取得了适当的平衡。中国认为自身的经济成就不是对全球经济的威胁，相反，如果没有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过去 20 年的全球增长将会严重缩水，尤其是亚洲的经济增长。中国还认为，当务之急是到 2021 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国家使命，到 2049 年取得世界领先的经济地位，这代表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合理愿望，这是中国政治领导层最大的关注点，而不是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的野心。

至于中国对邻国的政策，中国希望建立最良性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最大程度地适应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因此中国特别重视 14 个陆上邻国以及与这些国家建立积极关系的愿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能理解中国最近为什么在努力缓和与印度、日本之间的领土争端。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原领土曾受到来自东北方“日本、满”和来自广袤北方边境地区（蒙古）的入侵。中国认为自己很少向外扩张过，虽然清朝时中国的领土面积几乎翻了一番。对于陆上周边地区，中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加强中亚、南亚、中东、西非和东欧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战略机遇。中国希望将这个大陆动脉转化为未来主要的经济走廊，既为本国的金融、建筑和能源企业提供新的市场，又提升欧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也会减少未来伊斯兰极端分子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威胁。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横跨整个东南亚群岛，穿越印度洋，进入红海，中国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也与陆上丝绸之路相似。中国也有兴趣看到这片巨大的区域成为其商品和服务的新市场。用中国自己的话来说，这是该地区各国的“双赢”机会，尽管最近对于这个说法的争议层出不穷，最引人注目的是事件是，由于斯里兰卡政府无法还清修建汉班托塔港的贷款，于是将该港口租给中国 99 年。

中国也将一带一路视为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合法表现，一带一路为中华民族国家创造了一个更广泛、更温和的周边邻国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希望成为沿线各国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和支持力量。

在中国的海上周边地区，中国领导层到处都能看到对手和威胁：韩国、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组成的美国军事联盟。中国质疑这些同盟的政治合法性，并声称其反映了一种过时的思维，虽然冷战

在 25 年前就已经结束，但这种思维还停留在那个年代。中国外交致力于削弱这些同盟，甚至可能当政治条件和时机成熟的时候将其消除，中国也将这些联盟视为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战略力量。

在这一点上，中国感受到了美国军队前沿部署的威胁，从北部的韩国和日本到南部的新加坡和达尔文港，以及关岛。中国认为，美国海军和空军在与中国相邻的海域行事激进，尤其是美国侦察机有规律、密集地沿东海岸监视飞行，这给中国带来极大的威胁。中国在外海地区的关注重点是美国持续的战略部署，因为中国认为此举是为了挫败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政治愿望。

中国自己的军事力量在海上和空中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原则是：在台海出现安全危机的情况下，使美国很难对台湾进行军事援助。换句话说，中国寻求改变台湾海峡两岸的力量平衡，以致美国在未来两岸出现军事危机时都会再三考虑是否部署美国军事力量以支持台湾。事实上，中国认为必须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和平统一这个“脱离的”省份而不耗费一枪一弹。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中国认为必须继续扩大军事能力，对抗美国对中国的威胁，不仅仅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有其他可能危害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

此外，在海上周边地区，中国继续部署重要的海陆空军事资产，支持其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张——这些力量不太可能逐渐减少。中国相信，在奥巴马当政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国已经收回了一些南海的岛屿并加以开垦和军事化，现在将通过与有关东盟国家的双边和多边谈判，最大限度地利用外交手段逐步兑现自己的领土主张。

因此，中国将继续对抗美国和其盟国所主张的任何在南海地区的航行自由权。就未来军事突发事件可能性而言，南海仍然是中美之间最不稳定的因素，是中美海空力量会发生军事摩擦的热点地区。在东海，中日之间存在摩擦；在台湾海峡，大陆和台湾之间存在摩擦；在南海则是中美直接摩擦。因此南海会上演最危险的戏码——不仅是突发事件的可能日益增加，也可能升级为政治和军事危机和冲突，甚至有可能发展为局部常规战争。

最后，中国会说，就全球秩序制度而言，无论是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还是 20 国集团，现在是中国发出更响亮声音的时候了——不仅针对这些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针对人员配置、制度设计和具体运营。这些都已反映在中国领导层最近的一些官方声明中。

在这些遵循由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传统多边机构之外，中国还在寻求建立自己的新体制机制。这些既包括一带一路，也包括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还可能会产生其他类似的机构。由于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多边秩序体制机制不感兴趣，所以，相比中国在其他方面日益提高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在国际系统和全球治理上推行的积极政策很少受到美方的直接回应。相反，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更能亲身体会到中国这一更积极的多边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主张，鉴于2018年中国的相对经济规模，以及未来十年的可能规模，中国对全球机构的管理施加直接影响是公正合理的。然而，此举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远比这个主张更为复杂。中国在现有国际架构、组织、习惯和规范上有更大的话语权，这是可以为国际社会所理解的。但是中国开始改变国际系统架构本身，开始在国际系统架构外构建新的组织，特别是具有不同行为特征的组织，这就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论。

尽管如此，上述内容大致代表了习近平治理下中国世界观的核心内容。中国世界观也是一个概念上的框架，中国将在该框架下对美国当前对其提出的主张做出回应，而美国也开始调整战略方针以应对中国的不断崛起。

中国的挑战

然而，假设这些都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而得到的观点，那就错了。事实上，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角度看待国内和国际环境时，大多数地方都存

在困难、威胁和挑战。例如，中国面临国内经济疲软问题，还有鉴于特朗普总统针对中国的新战略以及副总统彭斯最近呼吁对中国采取对抗的态度，中国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挑战。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在全能、无所不知的庞大政治体系推动下的所向披靡的经济主宰者，但这个想法是危险的，因为现实比想象复杂得多。

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是在全能、无所不知的庞大政治体系推动下的所向披靡的经济主宰者，但这个想法是危险的，因为现实比想象复杂得多。

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国内经济挑战，其中包括2013年首次公布的经济改革放缓。因此，中国民营企业，也就是中国近期经济和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越来越受到中国国有企业的挤压。此外，中国最新的去杠杆化运动，减少了宏观经济和宏观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也同样限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活跃活动。还有，目前已经进行了五年的反腐败运动，导致中国民营企业和负责监管民营企业的有关国家单位对新项目的审批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除此之外，党在中国民营企业中的监管作用也在加强。这些都是特朗普宣布对华贸易战之前发生的。

所有这些变量累积起来，在 2018 年爆发，使中国商业和投资者信心螺旋式下降。所以在最近几周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和负责经济的刘鹤副总理越来越急切地表达对民营企业的支持。虽然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回应还有待观察，但这些呼吁本身反映了中央对国内经济实际状况的焦虑。

于是，中美贸易战的未来发展轨迹显而易见。如上所述，贸易战已成为阻碍中国国内商业信心的要素之一。而且数据就足以解释一切：美国是一个 20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每年

当然，从长远来看，美国对中国进口施加的 25% 关税对美国经济会产生重大的通货膨胀影响，直接影响特朗普总统自己的蓝领选区，这些选区依赖中国进口的消费品来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

向中国出售 1300 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 12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每年向美国出售 5000 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如果贸易战延伸到所有出口，并且不是以利润率征收，而是以 25% 的总体关税率征收，那么至少在短期内，其对中国的伤害将超过美国。

当然，从长远来看，美国对中国进口施加的 25% 关税对美国经济会产生重大的通货膨胀影响，直接影响特朗普总统自己的蓝领选区，这些选区依赖中国进口的消费品来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因此，我们怀疑特朗普是不是真的希望贸易战在 2019 年和 2020 年恶化，因为贸易战会对美国居民消费价格、通货膨胀带来长期影响，并让美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

因此，除了其他外部政治因素的干扰（包括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以及穆勒对通俄门的调查等影响特朗普政权的因素，中美两方应该有合理的利益趋同点，以便两国领导人在本月晚些时候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上通过谈判解决当前的贸易战。

中美经济关系还有其他突出的争端，如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让，以及推动中国高技术主导地位的中国国家产业政策，因此更难以看出双方如何能够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更有可能带来大幅减少贸易逆差的短期协议，可能让美国取消或调整已经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可能需要 6 到 12 个月的时间来推进美国所要求的全面贸易和投资关系结构改革中的一些事项。

但是，很难看出，这样的结果如何缓解我发言开篇所说的战略层面上中美关系的普遍恶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和美国的战略思考者认为，我们现在面临未来长期双边关系总体方面的深刻结构性变动，是由两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和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鸿沟所决定的。

如果事实证明这种广泛的宏观战略趋势确实如此，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希望在这两大军事和经济巨头之间，这两个对地区和国际战略环境有根本影响的大国之间，走出自己国家的未来战略路线的其

他人来说，不可不察也。

对东盟的影响

那么这一切给东南亚国家带来了怎样的思考呢？东盟的问题在于，东南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两大强国之间战略影响的“新的大博弈”地区，是下一个世纪大国为争取战略优势而进行政治、经济和外交斗争的主要领域。东南亚在地理和政治上位于亚洲陆地东北部的中国和西南部的印度之间。对于东盟来说，不幸的是，这意味着现在正处于一个令人寻味的时期——因为中国希望其南翼地区更加温和、更愿意包容中国的战略利益，而美国寻求维护南亚群岛海上通道的国际航行自由，也希望能够自由进行战略机动。

我毕生都致力于支持东盟。半个世纪前，这里在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严重分歧，现在已经转变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战略高度统一的地区。并且，这种战略统一是东盟十个成员国各自不同的内部战略体系的协调。因此，东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个战略上极其不稳定的区域变成了一个长期战略稳定的区域，并且促进经济几十年来不断增长。

当然，东盟也面临重大危机。东亚和西太平洋的中美关系日益两极化，开始将东盟分为亲美和亲中的阵营，这不符合东盟的利益。在我看来，这也不符合整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分裂的区域会产生不稳定性。当东盟和一个大国之间有相对的平衡，再去与另一个大国周旋的时候，东盟内部才会有最大化的政策选择自由，如果因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受到胁迫或限制，则无法获得这种自由。

因此，实际问题是，东盟可以做些什么？当然，这是东盟自己的事情。在雅加达和东南亚其他地方，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战略思考。东南亚在历史上就处理过如何应对外部强大势力的问题。我们在古代就已经看到过，在冷战期间也见过。现在也看到东盟正在面对中美两个大国。

东盟过去对外部挑战的一贯战略回应基于两个核心原则：第一，维护自身内部统一；第二，坚持对东盟中心原则的一贯主张。这两个原则不仅影响了对于东南亚本身的内部事务处理政策，也影响了东盟与东亚的接触。这反映在东盟和周边国家的体制机制发展上，如东盟+、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

东盟的问题在于，东南亚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两大强国之间战略影响的“新的大博弈”地区，是下一个世纪大国为争取战略优势而进行政治、经济和外交斗争的主要领域。

我认为，东盟的时机已经到来，秉持着这两项传统——对内统一性和对外保持中心地位，东盟的志向可以比以前更大些。事实上，东盟有一种危险，即过于注重合意，而变得过于被动，导致对自己的利益过于不作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东盟未来的活力取决于是否能在快速变化的外部战略环境中积极应对，制定东盟未来前景。如果东盟不设置自己与地区接触的条件，那么两个大国就会越来越多地设定条件。

东盟未来的活力取决于是否能在快速变化的外部战略环境中积极应对，制定东盟未来前景。如果东盟不设置自己与地区接触的条件，那么两个大国就会越来越多地设定条件。

首先，东盟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和维持在处理外部力量方面的共同立场。就中国而言，这种共同立场包括整个南海事务，特别是“行为准则”的谈判。就美国而言，这可能意味着东盟未来针对美国军舰在东南亚地区航行所采取的态度。无论挑战的性质如何，在区域关注的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果共识经常因为一小部分国家的反对，甚至是某一个国家的反对而无法达成，那么东盟就必须运用“10-X”公式，少数服从多数。基于满足所有国家需求的“最小公分母”原则的政治，如果走到极端，可能会使整个东盟失灵。

其次，东盟现在需要大胆向外看，接触其他地区，而不是只关注来自内部的挑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东盟需要越来越多地关注东西两岸——太平洋和印度洋。实际上，东盟现在应该发展出自己的印度—太平洋未来战略概念。当然，这也是东盟传统思想的一部分。但是迅速变化的战略现实要求东盟现在加强这项工作。东盟的地理位置也表明无论如何都应该如此。东盟的一半成员国面向印度洋，东盟超过一半的人口也面向太平洋。同时，东盟也是跨越东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海上运输走廊。当然还有印度的因素，其是东亚峰会（EAS）的成员国。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已经采取了“向东看”或“向东行”的政策。无论我们是否接受，中国和美国两国对这两片大洋的未来都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如果东盟没有发展出自己对未来印度—太平洋地区形态的战略概念，那么东盟将只能被动接受美国和中国的地区战略概念。

第三，东盟的印太战略概念意味着什么？十年前，我发起建立亚太共同体的倡议，希望以东亚峰会为基础来进化出一个区域共治的，大家安全政策和经济合作的习惯、文化和实践不断演化的，共同体。

去年，作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主席，我主持了一个国际委员会，旨在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该委员会成员有印度尼西亚前外长尼马蒂纳塔莱加瓦、韩国前外长金星焕、日本前外长川口顺子和俄罗斯

斯前外长伊万诺夫、印度和美国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和多尼隆、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小组成员王缉思。这个委员会主持撰写一篇题为“维护亚洲长期和平：区域长期安全的体制基础”的政策报告。

东盟对印太地区未来的愿景是什么呢？我相信该报告中的想法可以给东盟自己的内部讨论提供参考，也可能给印度尼西亚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提供参考。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是切实可行的，重点是逐步建立不同形式的安全政策合作，从共同管理应对自然灾害到军事透明，再到其他形式的信任和安全建设措施。这样的概念并非旨在取代区域内现有的安全硬件，而是旨在减少这些硬件的脆弱性，并逐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创造更大的共同安全感。我相信，这样的概念与东盟内在的基因相符合。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概念还建立在现有的东盟机制——东亚峰会的基础上，该机制是根据“吉隆坡宣言”建立的，东盟在十三年前已经同意建立一个包含安全 and 经济合作的泛区域机制：换言之，无须增加东亚峰会的现有任务。此外，委员会的报告为亚太甚至印太共同体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建议，印太共同体也建立在 2011 年东亚峰会领导人阐明的“巴厘原则”的基础上。报告还包含了东盟国防部长会议的机构作用，该机构每年应召集该地区的十八位国防部长开会。

然而，重要的是，报告建议了东亚峰会其下一阶段的制度发展。否则东亚峰会便会因为缺乏实质性的机构职能而逐渐消失，仅不定期偶尔会面。东盟再也不能完全依赖其泛区域召集力量。如果东盟希望可靠地维持其长期存在的东盟中心地位，那么还必须开始为东南亚以外的更广泛区域制定愿景，也必须为未来建立更加强大的泛区域安全、经济和政治合作机构，并且在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战略范围内这样做。

结论

然而，要想实现上述目标，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就要在东盟体制机制的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也要和印度尼西亚就未来体制机制架构进行建设性合作。但是澳大利亚现任政府的不负责任的政策立场，可能会阻碍这种建设性关系。澳大利亚作为 20 国集团成员国，有责任认真考虑各种全球政策问题，不仅包括我们自己地区，还包括中东等其他地区的问题。

作为全球负责任的中坚力量，以及本地区的重要力量，澳大利亚必须始终坚持有原则的外交政策。几十年来，历届澳大利亚政府都这样做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始终建立在我们一贯的国家价值和国

家利益之上。这不仅适用于针对本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所采取的政策，也适用于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应对政策。并且澳大利亚最近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还被选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因此，澳大利亚在关键的国际政策问题上的发声，不仅是自身观点的阐述，（也在国际社会得到了认真对待），这或是令澳大利亚国内政界人士惊讶的，譬如关于中东和平进程，我们长期以来主张“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需要解决“最终地位”问题。“两国方案”基于一个基本原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永久和平共存。尚未商定的“最终地位”问题涉及 1967 年的边界划定以及双方之间合理的土地交换；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权的未来；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国家首都的未来；以及未来圣城的托管问题。

特朗普政府放弃“两国解决方案”并单方面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的决定对中东和平进程构成了根本性的暴力威胁。这可能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极右翼政府的首选立场，但并不一定代表以色列议会和广大人民的立场。巴勒斯坦人民被迫与自己的长期家园分离，导致矛盾激化，引发第三次暴乱，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历届澳大利亚政府长期支持两国解决方案，将大使馆设在特拉维夫，抵住内塔尼亚胡的压力，没有将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令人遗憾的是，莫里森总理选择背离了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两党的共识。他似乎是为安抚澳大利亚极右翼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利益来达到国内政治目的。这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中立国所采取的负责任的做法。事实上，这一做法由于过于偏狭而牺牲了澳大利亚的国际政治信誉。作为澳大利亚前总理和外交部长，我呼吁莫里森总理放弃这种愚蠢的立场。他不应该推翻他的所有前任（包括前总理霍华德）已经坚持了几十年的决定。他应该把这种立场抛诸脑后。

中国和美国未来对东南亚的态度将更加明确地决定我们地区的未来。中国对该地区的战略相对明确：通过联合部署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市场和直接经济援助的长期作用，成为东盟国家不可或缺的经济伙伴，并以此提升中国在该地区长期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筹码。

相比之下，今天美国对东盟的战略则不那么明确，仅美国国防部在东南亚与多个国家的部队进行战略接触。美国国务院正在削减预算，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足迹减少。美国国际开发署正在精简机构。最重要的是，美国并没有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替代方案，也没有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倡议。这是美国战略中的一个根本缺口，美国的政策中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事实上，向东南亚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投资的唯一替代方案是日本，以及某种程度上印度，但这些都远未达到“一

带一路”的规模。

假设美国决定回归地区事务，美国可能面临的风险就是东南亚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存在。未来几年，美国可以通过国内政治进程改善未来在全球的作用，但东南亚变化的步伐不会停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冷酷的现实将滚滚向前。美国在两年还是六年内重新回归东南亚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段“空窗期”，地区大国可能会继续采取对冲措施来保全自己。

在我看来，东盟面临的挑战都不容易。但是，国际关系的大多数系统性挑战都很困难，尤其是当前根本的地缘战略结构正在经历动荡。这很大程度上是由 21 世纪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不断变化的结构性关系导致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东盟仍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帮助我们更广泛区域的共同和平与繁荣，并且在现有全球规则秩序原则和实践范围内这样做。但如果东盟停滞不前，那这一点将无法做到。实际上，停滞不前可能是未来东盟采取的最削弱自身的姿态。因为那时东盟就会越来越成为“价格接受者”，只能接受区域以外的人设定的区域性条款，而不是设定自己的战略路线，也不能创造条件与其他大国接触。

作为东盟第一大国，也是 20 国集团在本地区的唯一成员，印度尼西亚可以通过在东盟更积极作为，为印太地区的未来做出积极的贡献。

6. 2019 年的中美关系

在纽约亚洲协会总部的演讲

2018 年 12 月 5 日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Nicolas Asfour. AFP. Getty Images. 2017.

今天是悼念老布什总统离世的日子。

老布什总统是一位真正卓越的总统。对于我们这些见证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冷战结束以及 90 年代初中美关系的重启的人来说，老布什总统是一位卓越的美国人、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今天，我们缅怀他。

过去 12 个月，亚洲大部分地区已经了解到我们所见证的中美关系以及朝鲜事务的新动态。仅仅 12 个月前，美国和朝鲜似乎还处于武装冲突的边缘。朝鲜领导人因持续推行核武器计划受到暴怒的特朗普总统的威胁。12 个月后，特朗普总统和金委员长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后，似乎已成为最好的朋友。尽管到目前为止，在无核化方面似乎仅取得了微不足道的实质性进展，但朝韩关系已出现前所未有的解冻。

12 个月前，特朗普总统刚刚结束他在中国的国事访问。在中国的时候，特朗普终于放下了 2016 年竞选中宣扬的反华言论。但 12 个月后，中国和美国处于一场尚未解决的贸易战中，而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布，过去 40 年来美国与中国的“战略接触”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战略竞争”时期已经开始。

12 个月前，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和市场还在迅猛发展。12 个月后，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各经济体发展速度开始放缓，但是人们对经济、就业和收入水平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担忧开始出现。

如果一周的时间在政治、国际关系和经济算长期的话，那么一年可谓永恒了。在这三方面的重大变化中，中国仍然是主导力量。今年，我们一直在探索三个大问题：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如何变化；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如何变化；40 年来中美关系起了多少波澜，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才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定海神针呢？

换句话说，两国现在是否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警告的那样，处于“注定一战”的状态——无论是冷战，热战或在两者之间？还是说，两国在可以共同接受的新型共同战略叙事的基础上，可能达成新型战略平衡呢？事实上，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要找到答案，我们必须突破偏见和误解，思考我们的价值、利益和身份，认真考思索何为本、何为末、何处需要妥协、何处应当竞争。

对于这些问题，我还在深深的思考中，今天或许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深刻意识到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的紧迫性。因为我们现在处于潜在的危险地带，类似某种“无人之地”，一边是已经存在了

今年，我们一直在探索三个大问题：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如何变化；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如何变化；40 年来中美关系起了多少波澜，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才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定海神针呢？

几十年的战略设想，另一边是竞争无处不在的美丽新世界。

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我们发布了一系列演讲，开始分析我们所面临的集体挑战的核心。3 月，在西点军校，我谈到“习近平想要什么”的问题。6 月在新加坡李光耀学院，我开始分析习近平新兴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源头。9 月在硅谷，我谈到了中美之间高技术战争的可能演化。10 月在海军学院，我分析了美国对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战略回应，即美国对华新政——战略竞争主义，并提出了我对此政策形成与落实的一系列问题。最近在雅加达，我试图分析中美之间新兴的战略分歧对东南亚意味着什么，因为东南亚已经成为中美提升战略影响力的必争之地；东盟本身还要应对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和一个疏离、多变且多半靠不住的美国。我们还需要分析类似框架内的其他区域：非洲、亚欧大陆、中东、南亚和拉丁美洲。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地区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

我今天发表的演讲，是这个系列讲话的一部分，主要希望谈谈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结束后两国关系会如何演进；持续的贸易战对中国正在展开的经济政策辩论在当下和未来可能影响几何；以及未来一年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我总是受到亨利·基辛格先生的提点，他在战略分析中要求我们首先了解我们所看到的東西，然后问我们忽视了什麼，然后才能讨论关键政策问题。

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

因为各自不同的理由，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所做的是争取时间。他们争取到了三个月的时间。尽管很短，但很宝贵，因为没有这个缓冲期，下个月两国之间就会爆发全面贸易战和更广泛的经济战，进而可能引发全球市场信心的进一步崩溃，尤其在中美国内经济出现其他负面趋势的背景下。然而，纵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都认为中美会在贸易上达成某种形式的交易，我们也要清楚认识到一事进展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此间的不确定性还很高。

首先，有五个复杂的政策分歧需要解决。第一，目前每年 3700 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逆差需要减少，然后可能要削减关税税率。目前中国平均关税税率约为 9.8%，而美国为 3.4%。其次是每个经济体中最具政治敏感性的行业，首先便是农业：农民群体是美国共和党的重要票仓，中国历来也很重视粮仓的充实。接着是三个长时间都难以解决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技术转让（美国术语）以及利用中国举国支持国家产业战略（中国制造 2025）——该战略旨在让中国在 2030 年之前主导全球先进技术和产品标准。这三者才是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将 2019 年 3 月 1 日设定为解决上述五个问题的最

后期限是明智之举，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和习近平在3月早些时候可能举行工作级别的峰会，这就更明智了。但我注意到一些贸易专业人士认为，在90天内就解决问题简直是不自量力、不切实际，注定双输。

从别的角度来看，这90天的暂停也有利于特朗普和习近平。到3月份，特朗普将更全面地了解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格局。他将了解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后美国经济会有多疲软。他还会了解，如果中美两国的努力化为乌有，美国经济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承受增加关税的压力。政治方面，穆勒的调查结果也应该在3月份左右完成。如果调查是特朗普严重不利，那么我们应该警惕特朗普在穆勒调查后新要求对中国加倍打击的可能性——如果事实上调查结果是特朗普在通过我们收到牵连的话。这是我们中国朋友担心的“未知因素”。

三个月也给习近平和他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以机会。在国际方面，中国也许会在1月份达沃斯论坛上释放出大胆的贸易信息。中国一直试图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其维护全球经济和环境秩序的努力。中国关于全面贸易自由化（不仅仅是与美国的双边贸易）的重要声明可以震动世界。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也可向世界发出一个鲜明信号。这确实可能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构成严峻的新挑战。

此外，中国对贸易自由化的严肃承诺，伴随着国外公司与国内公司之间、私营公司与国有企业之间竞争中立的基本情况，将加强最近几个月刘鹤为重新全面实施已经陷入停滞的中国“二期经济改革”所做的努力。此经济改革始于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是中国自身经济利益所急需的。

这就让我们回到这两者互动关系的核心——中国在对美经贸谈判中的让步，是否能倒逼中国国内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未来实现强劲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改革。

不断变化的中国国内经济情况

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习近平政府在2013年11月首次发布的经济改革蓝图至关重要。这一点在他上任初期已经体现。经过激烈的内部辩论，中央最终就改革原则达成一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关于改革的决定包含了60项不同的改革措施，涵盖十大类，包括贸易、跨境投资、国有企业改革、竞争政策、金融体制改革、财政政策、创新政策、劳动力政策、环境政策和土地政策改革。当时中国经济领导层有意识地将中国过去35年的历史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当时普遍称之为的“新模式”。

我们都熟悉的旧模式基于两大支柱：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成本出口制造业；以及政府对国家经

济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来强化第一支柱。新经济模式则基于三大支柱：高水平的国内消费；国有企业驱动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私营企业驱动的创新；还有：一场可持续发展革命。

经济改革在 2014–2015 年开始实施，但到了 2015 年 8 月，中国股市和金融市场的崩溃让党对整个市场的信心受到了沉重打击。从那时起，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开始跟踪分析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度，并根据最新的数据和分析制作中国经济仪表盘。我们看到经济改革的实施速度大幅放缓，且大部分近乎完全停止。中国的资本账户也受到严格的管制，私营企业难以扩展海外业务。与此同时，由于担忧中国债务与 GDP 比率的合理性、“影子”银行的失控、地方政府债务不断膨胀，中央政府开展了全国性的去杠杆。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做法也导致金融机构不分青红皂白撤回经营良好的私营企业的信贷。与此同时，去杠杆化运动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小于私营企业，所以国企也有了一线新的生机。

此外，中国反腐运动的持续影响从根本上减缓了政府决策的过程，因为官员都试图保护自己免受政治风险，这意味着私营企业主导发展的项目也开始放缓。与此同时，习近平强调了党的核心作用和意识形态的首要地位，从而加强了党委在私营企业中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所谓“混合所有制模式”的确切影响也较难判断——这种模式到底是让私营企业吸收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还是实际上为国有企业创造了新的机会，使其可以“国有化”经营良好的私营企业。

在 2018 年上半年中美贸易争端开始之前的几年里，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中国经济集中出现。越来越多传闻指出了上述所有因素的最终影响：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私营企业因为担心政策环境的日益恶化，开始限制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的进一步投资扩张。事实上，从今年 8 月北戴河休假时开始，全国各地都开始有报道称，私营企业面临危机，信心受损，这对未来经济的增长具有潜在和深远的影响。

从困境到机会：竞争政策的改革

就在这个时候，那些长期了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持续必要性的人看到了摆脱逆境的机会——通过开放吸引更多外企，以在中国经济下一波改革中实现竞争政策改革，从而促进长期生产力增长。竞争政策改革长期以来一直是 2013 年国家经济改革蓝图的关键部分，但已被搁置。

中国表现欠佳的金融服务业尤其需要有效的竞争政策。在任何有效的市场经济中，公司间对于资本有效配置的竞争是基于潜在借款人提出的商业案例以及贷方所愿承担的相关风险，这对可持续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相比之下，尽管国内私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中国金融服务业发展效率还是低下，因

为资本配置决策的驱动力较少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而更多是出于政治或行政的要求。

中国经济改革者完全意识到了中国金融体系中这个核心问题的各个方面。改革者认为，未来不仅需要让负债累累的二级银行和国有企业摆脱先前的借贷习惯，恢复到合理的借款限度，他们同样认识到了将市场规范引入未来资本分配决策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不仅仅是整理过去的决策，还要为未来创建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框架，以便合理分配金融资本，使得公司债务问题不会再次爆发。

改革者认为，未来不仅需要让负债累累的二级银行和国有企业摆脱先前的借贷习惯，恢复到合理的借款限度，他们同样认识到了将市场规范引入未来资本分配决策的重要性。

中国改革者也认为，外商独资金融机构更多地进入中国国内市场是将市场原则融入中国体系的新方式。这与以往中国允许有限的外国金融机构参与中国市场的方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外资主要局限在二级银行的少数股权并受到中国银行业官员政策目标的限制，这些官员的目标是“学习”西方人做生意的方式，但最终要求西方人离开。新的方法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体制，在金融服务业的广泛领域内引入大量外国竞争者，从而迫使中国企业提高效率。

例如，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缓解了外国投资进入 45 万亿美元的金融服务业的部分限制。其中包括：

证券公司和共同基金的外国投资股份限额在 4 月份上调至 51%，设定三年过渡期，允许外资实现全面控制。事实上，上周五，瑞银已经成为第一家获得多数股权批准的外国证券公司，摩根大通和野村证券也正在申请。

截至今年 5 月，外国保险公司现在可以获得国内保险公司 51% 的控股权。11 月 25 日，德国保险公司安联获批成为第一家外商独资保险公司。法国安盛集团很快跟进，于 11 月 26 日购买了先前合资企业的股份。

银行和其他债务管理机构的外国所有权限制也在 8 月被取消。之前，外国公司的比例作为单一实体仅限于 20%，作为财团仅限于 25%。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外国公司申请使用新规定。

对于私营企业发展的额外鼓励

外国投资者参与增加能促进金融服务改革。此外，在中国一些私营企业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更多相

关改革也被提上议程。11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一份政策说明^⑥，其中涵盖了以减少私营企业税务为中心的26条具体措施。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说法，这些措施还未得到充分使用。尽管如此，新一季度中，中国的中小企业税收减免超过了1430亿元(210亿美元)，比去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了41%。

除了各种改革措施之外，中央政府最近还发布了旨在改善中国企业信贷有效性的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于11月7日概述了新的所谓“1-2-5”政策：要求大银行至少将三分之一新的公司贷款业务拓展到私营公司；至少三分之二的新贷款要从中小银行发放；以及在接下来的三年中，银行系统中，至少50%的企业信贷将扩展到私营企业。

中国开始迈向新的政治经济模式？

重复一下：这个新的政治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者们能否有一套党内国内都可以接受的叙事，来说明中国在对美经贸谈判中的让步，是为了倒逼中国国内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未来实现强劲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改革。

这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因为至少在过去几年里，习近平的核心政治关切在强党、强政以及展示更具民族主义的姿态。尽管如此，习近平开始接触到了经济现实——中国的现实——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对中国真的很重要！如果经济政策从左到右的全面调整继续下去，那么这可能会成为中国改革的重大时期。

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对经济政策进行修正的先例。天安门事件仅仅三年后，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南巡，他告诉全中国，要加倍努力地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做到了。五年后，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江泽民对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说，“走出去”，他们也做到了。五年后，朱镕基在2001年末确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预示着中国经济改革计划的下一阶段，包括中国之后成为全球出口超级大国。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政策转向，可能也会遵循前路渐次发生。我们需要认真阅读：习近平主席9月

这个新的政治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者们能否有一套党内国内都可以接受的叙事，来说明中国在对美经贸谈判中的让步，是为了倒逼中国国内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未来实现强劲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改革。

^⑥ 李霞，“中国减轻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新华社，2018年11月19日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11/19/c_137617997.htm

末至11月初五谈民营企业^⑦；刘鹤副总理10月19日关于民营企业的讲话^⑧；以及11月末G20峰会前的汉堡经济论坛上对于中国未来经济方向的全面声明^⑨。

当然，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出错，导致这个政治势头停滞不前。

中国官僚可能会多手准备，然后按兵不动。或者，更糟的是，他们可能只是依靠一大堆非关税壁垒来破坏中国的整体贸易和投资政策环境改革的文件和精神。除此之外，中国的民营企业仍然面临对资本账户的极大限制，可能不会对党和政府当前要求他们做的事情积极回应，理由是政策和监管有太多不可能性，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投资未来的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观察中国私人固定投资的最新数据，了解中国企业是否对中国高层的最新政策信息买账，从而可以开启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阶段。

展望 2019

在如此经济背景下，2019年的中美关系前景如何呢？到3月份，中美很可能会就双边贸易逆差减少以及中国的进口决定达成协议。在3月份实现关税改革，尽管技术难度很大，但仍是可能的。如果采取关税细目逐步递进的办法，并考虑目前适用于整个贸易体系关税的多样性，可能会远远超出3月份的时限。然而，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者更大胆些，承诺逐步实现零关税，并挑战美国人也这样做，那倒是可以出其不意，一鸣惊人。当然，这与中国贸易官员半个世纪以来所信奉的“能不给就不给”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让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更是不易。

在中美企业之间的合同安排中，所谓的强制技术转让改革应该是相对直接的。然而，即使没有任何具体的技术转让条款，改革所希望的也与实际解释合同安排的方式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很大问题。问题不仅存在于传统形式的商业间谍活动，还存在于网络间谍活动。以前在奥巴马政府下达成的协议可以重新制定。但是，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关键问题仍然是管辖权。建立互信的一种可能机制是，中国和外国公司之间的所有相关合同都由新加坡或瑞士的国际商业仲裁制度的约束。这些制度约束可

^⑦ 习近平，“关于一个月三次的私营经济会谈：习近平的讲话揭示了什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8年10月26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8/1026/c385474-30364832.html>

^⑧ 刘鹤，“中国副总理发言将坚定不移地支持私营部门”，新华社，2018年10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8-10/19/c_137544504.htm

^⑨ 刘鹤，“汉堡峰会：当中国遇到欧洲”（德国汉堡峰会主题演讲，2018年11月27日）https://hamburg-summit.com/images/summit/2018/Speeches/13_2018-11-27_HS2018_Keynotespeech-Liu-He.pdf

以设计为专门处理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现在，将争端诉诸国际商业仲裁这种方式在全世界已经相对普遍。如果中国不愿意这么做，那么也可以发展国内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但是，如果希望外国人对中国体系有信心，就要聘请合格的外国人加入其仲裁小组。其他国家已经这样做了，中国也可以这样做。鉴于中国缺乏司法独立，上述方式也许是协调双方关系的唯一方法。

就中国通过国家补贴来实现对国内和国际高技术市场的主导这一点来说，怕是很难找到任何现成的应对方案。实在来讲，所有国家都对其本土技术产业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政府补贴。即使我们规定国家能够给予公司支持的最大比例（通过国家研发支持或其他相关的税收减免），如何衡量这些支持手段也总会出现问题。因此，我看这一领域的谈判难有实质结果。美国可能需要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大幅增加公共研发投入来和中国竞争。我敢肯定，重点公立大学会大力拥护这一举措。

如上所述，我们也不排除 2019 年中国可能会推行其准备实施的任何关税改革，以便向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寻求美国对华贸易战的解决方法。例如，我们不应该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中国要采取一些激进措施——比如随着逐步承诺零关税——这样的承诺不仅仅是根据美国的互惠措施做出的，而是根据所有 WTO 成员国的互惠措施做出的。实际上，中国将迎来极大的地缘政治机遇，支持全球自由贸易，遏制目前威胁全球经济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此外，我们不应排除中国主动接触 TPP11 成员国，并通过谈判寻求加入 TPP 的可能性。这一举动将在亚太地区全面包抄美国。最初由奥巴马政府设计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一部分的 TPP，最终可能接纳中国，而不接纳美国自身，这将会极具讽刺意味。中国在看到政治和市场的机遇时，可能会非常主动。技术谈判当然是艰巨的，但是，已有证据表明日本对中国加入 TPP 的传统保留态度可能有所缓和，这一点在安倍首相最近访问北京期间得到证实。

在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方面，2019 年，中国可能会越来越保持距离。已经有证据表明中国与东京关系的正常化。日本海岸警卫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进入东海尖阁列岛 / 钓鱼岛地区的频率急剧下降。中国还在寻求通过加强对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缓和与东盟在南海的紧张关系。与美国的海事事件仍然很严峻，如果美国在来年实施更激烈的航行自由行动，那么双方关系可能会变得更加尖锐。在 2018 年 4 月与莫迪总理在武汉举行双边会晤之后，中国也试图缓和与印度的紧张关系。这一态势可能会在 2019 年即将举行的印度全国大选中保持下去。中国大陆也可能在 2019 年开始缓和对待台湾的态度，因为在最近的台湾地方政府选举中，民进党的结果非常糟糕。当然，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大规模出售武器，大陆的这种态度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整个欧亚大陆，“一带一路”倡议继续得到实施。但对于那些密切观察中国的人来说，至少在

过去的几个月里，“一带一路”在中国的政治宣传相当少。当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是中国正在讨论修改“一带一路”中的某些部分。斯里兰卡事件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他们也非常关注斯里兰卡方面能否长期负担得起这个数万亿美元项目。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2019年中国在“一带一路”上取得的进展比我们过去几年所见的少一些。

未来一年所有这些调整其实都是中国的一种策略，因为这样才能最终处理好与美国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关系。减轻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紧张局势是中国的明智之举。

中国在2019年会参与更广泛的国际体系，很可能继续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捍卫者，也有可能维持在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上的立场（即中国在巴黎协议上的立场）。换句话说，中国很可能利用这一时期巩固和扩大自身在现有国际治理机构中的作用，而不是继续建立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的国际治理新机构。

中国很可能利用这一时期巩固和扩大自身在现有国际治理机构中的作用，而不是继续建立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的国际治理新机构。

当然，“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继续发挥作用。但随着中国近期的制度创新，两者的国际影响力可能会同步下降。中国外交政策系统中一些更为冷静的人认为，最好将注意力集中在全球现有规则制度上，特别是当美国对这些制度和机构表现出系统性蔑视时。

总而言之，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对美国、第三世界国家和更广泛的国际体系的整体姿态发生战术转变，而非战略转变。中国可能会利用2019—2020年对美国政治未来发生的变化做出深刻判断。特朗普会被穆勒削弱吗？如果特朗普被穆勒削弱，中国的政策将是什么样的？彭斯相较于特朗普，会对中国造成更大的压力吗？民主党候选人如果在2020年取得成功，会对中国采取同样强硬的战略吗？如果是这样，民主党与共和党又有何不同？

在这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上，中国刻意缓慢行动。中国试图仔细分析战略和战术的部署环境。虽然中国领导层已经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确实有了很大的转变，但他们仍然不确定未来美国将采取何种确切的措施来对待中国。因此，从战术上讲，中国可能会争取时间来弄清这些问题，同时尽可能缓解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并努力对美国未来的战略方向和政治决心做出更为根本的判断。

这符合中国长期而非短期的偏好。目前，中国认为在接下来最多两年内，特朗普会给中国带来问题，因为可能两年后他就会被另一个关注不同重点的政治领导人取代。而中国同样认为习近平不仅会再领

导中国两年，而且可能会再领导中国十年，甚至更长。

结论

正如开篇所提，我们面对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夹在一场辩论中间：一方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民主政体，另一方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古老的持续文明（其对自由民主从未表现出任何的真实兴趣）。但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不论用何种方式。

当下，我们面对的两个对彼此偏见与日俱增的国家。美国人觉得中国人正偷走他们的未来——他们很生气，他们在觉醒，他们要反抗。中国人认为美国人在遏制中国，因为美国人无法接受自己将被中国超越；更无法接受一个亚洲国家成为世界第一。

这场中美大辩论将是白热化的。所以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待双方。比如，我们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行为与美籍华人的态度和行为混为一谈。在美国及一些其他国家，我十分担心“新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在这场辩论中大家都需要谨慎言辞，这样美籍华人的爱国情绪才不会遭到质疑。

最近有报道称有外国势力干涉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外部干涉问题完全可以拿出来辩论。毕竟，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有法律、法院、执法机构、情报部门和其他机构来进行制衡，保护公民自由，防止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安全威胁。因此，解决外部干涉的最佳方案是公开各个机构获得外来资金的情况。见不得光的秘密行为才让人担心。

我很担忧，在如今这种激烈的政治环境中，新的“麦卡锡主义”会兴起。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一篇关于外国干涉的报告引发了一些人对报告的异议，包括报告的作者之一谢淑丽^⑩女士，我在这里表个态：我支持谢淑丽的看法。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比尔·毕晓普对报告的批评，将中国共产党简化为“中国”，会激起不当的反华情绪。

当我们继续进行这场关于中美未来的艰难辩论的时候，让我们从上一次冷战中，从乔·麦卡锡及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中，吸取教训。这场辩论需要完全的坦诚，而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走过场。我们都该对自己有更好的认识和期许。

^⑩ Larry Diamond Orville Schell, 中国影响力和美国利益：促进建设性警惕（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e Press, 2018）https://www.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docs/chineseinfluence_americaninterests_fullreport_web.pdf

总而言之,当我们继续进行这场关于中美未来的艰难辩论的时候,让我们从上一次冷战中,从乔·麦卡锡及其“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中,吸取教训。这场辩论需要完全的坦诚,而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走过场。我们都该对自己有更好的认识和期许。

报告全文及更多内容，请见：Asiasociety.org/TheAvoidableWar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系列报告

- 《维护亚洲的长久和平》
- 《亚太经贸一体化道路》
- 《东北亚碳市场路线图》
- 《东北亚与下一代碳市场合作》
- 《推动东北亚碳市场合作的商业行动》
- 《贸易风转向：美国的双边主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
- 《给美国第45任总统的建议：来自环太平洋的观点》
- 《中国经济仪表盘：追踪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 《避开死胡同：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全球影响》
- 《实现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一个来自中国的案例》
- 《特朗普政府的印度机遇》
- 《印度在亚洲的未来：APEC带来的机遇》
- 《调和期望和现实：一个转型中的缅甸》
- 《维系缅甸的转型的十大挑战》
- 《推进缅甸的转型：美国政策的前景》

为亚洲和美洲，谋划共同未来

亚洲协会是由洛克菲勒三世于1956年捐助成立，以促进亚洲和世界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为宗旨。亚洲协会已经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非政府、非盈利、非党派组织，总部位于纽约，并在香港、上海、伦敦、洛杉矶、马尼拉、孟买、旧金山、首尔、悉尼、东京、华盛顿特区和苏黎世设有办事处。

2014年，澳大利亚第26任总理陆克文加盟亚洲协会，出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创始主席。随后，美国前贸易副代表Wendy Culter，美国前助理国务卿Daniel Russel也加入，并担任副主席。近年来，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已跻身美国前50强智库，以及世界外交事务百强智库。

封面图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2017年11月9日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欢迎仪式。

（摄影：Thomas Peter-Pool / Getty Images）